

学校代码: 10200
分 类 号: K11

研究生学号: 2019100985
密 级: 无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近代日本亚洲同盟思想的嬗变 ——以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 为中心

The transmutation of Japan's thought of Asian Alliance
in modern times

作者: 潘妍

指导教师: 董灏智
一级学科: 世界史
二级学科: 东亚史
研究方向: 东亚思想史
学位类型: 学术硕士

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东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及答辩委员会人员信息

| | | | | |
|-----------|----|-----------------------------------|-----------------|-----|
| 论文题目 | | 近代日本亚洲同盟思想的嬗变 ——以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为中心 | | |
| 作者 | | 潘妍 | | |
| 指导教师 | | 董灏智教授 | | |
| 论文评阅人 | | 评阅人 1 | 匿名评阅 | |
| | | 评阅人 2 | 匿名评阅 | |
| | | 评阅人 3 | 匿名评阅 |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 | 主席 | 陈景彦 |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 教授 |
| | 委员 | 郑 毅 | 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 | 教授 |
| | | 韩东育 |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教授 |
| | | 大田英昭 |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教授 |
| | | 齐 畅 |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副教授 |
| | | 王明兵 |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副教授 |
| | | 胡天舒 |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副教授 |

摘要

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论”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最初的亚洲联合到逐渐扩张化最终右倾化，从而成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源流。本论文则以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为研究对象，对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进行分析观察，来探究“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何最终成为日本政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遮羞布。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的背景。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使中国跌落神坛，更使维系亚洲数百年的传统“华夷秩序”濒临崩溃。日本自汉代加入“华夷秩序”伊始，其始终游离在“华夷秩序”圈的外围，与中国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距离，拥有着强烈的力求与中国对等的意识。伴随着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日本也力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秩序观”。

第二章介绍了“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发轫，以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代表。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胜海舟提出“亚洲联合，共抗西洋”的思想，并付诸实践行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后世的“亚洲同盟论”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章分析了“亚洲同盟论”思想发生扩张化，以樽井藤吉的“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代表。在扩张论甚嚣尘上之时，樽井藤吉提出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的联合思想显得尤其不同。但究其根本能够发现，樽井藤吉对朝鲜的“合邦”是“吞并式的合邦”，“亚洲同盟论”思想中的侵略色彩更加浓厚。

第四章探讨了“亚洲同盟论”思想发生质的变化，以小寺谦吉的“亚洲同盟论”思想为代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快速发展，由于日本与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利益争夺，日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处境愈发困难。于是，小寺谦吉以人种论为着眼点提出黄种人联合，尤其是中日两国互相提携，并提出“支那保全改造论”，但其思想本质上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主义。

第五章通过对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的“亚洲同盟论”思想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亚洲同盟论”思想诞生之初的框架就是以日本为主导的。伴随着国际形势以及日本在亚洲地位的变化，“亚洲同盟论”思想由经历了从“兴亚”到“侵亚”，联合到侵略的本质性变化。

当今世界，伴随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探究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对建立正确的亚洲观具有重要意义，不论是采取何种制度、国力的强大与否，只有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构建同盟，才是实现亚洲迅速腾飞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亚洲同盟论；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Japan's "Asian alliance theory" in modern times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from Asian alliance to expansion and finally right deviation. Therefore, the theory has becom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Circle". In this paper, Katsukaishu, Tarui Tokichi and Odera Kenkichi a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analyze and observe the "Asian alliance theory" of modern Japan and explore why the "Asian alliance theory" became the fig leaf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Circle".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Asian alliance theory. The outbreak of the Opium War not only made China fall from the pedestal, but also made the traditional "Huayi Order" which Asia maintain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From the beginning of joining the "Huayi order" in the Han Dynasty, Japan was always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Huayi order" circle, keeping a distance with China, with a strong sense of striving for equality with China. With the collapse of traditional "Huayi order", Japan also tried to establish "Japanese-style Huayi order view" with Japan as the center.

Chapter two introduces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 of "Asian alliance theory", represented by Katsukaishu's "Asian Alliance theory". Facing th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Katsukaishu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Uniting Asia to jointly resist the West"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Although it ended in failure, it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later thought of "Asian alliance theory".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expansion of the Asian alliance theory, represented by Tarui Tokichi's Asian alliance theory. At a time when expansionism is in full swing, Tarui Tokichi's idea of "vert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union" with North Korea is particularly different. However,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to Korea is actually "annexation", and the thought of "Asian alliance" is more aggressive.

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the thought of "Asian alliance theory",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Kenkichi's "Asian Alliance theory".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developed rapidly. As Japan compet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for interests in Asia, Japan was in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situation among the imperialist countri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ace, Kōdera Kenji put forward the yellow race union, especially the mutual support of China and Japan,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preser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ut the essence of his thought is the bandit doctrine of invading China.

The fifth chapter analyzes the "Asian alliance theory" of Katsukaishu, Tarui Tokichi and Odera Kenkichi, and realizes that the "Asian alliance theory" is dominated by Japa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birth. With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Japan's status in Asia, the thought of "Asian alliance" has experienced the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Asia development to Asia invasion, alliance to aggression.

In today's world,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o explore the modern Japanese "Asian alliance the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the correct Asia outlook. No matter what system is adopted and whether the national strength is strong or not, only by adhering to building alliance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rapid take-off of Asia.

Key words: Asian alliance theory; Katsukaishu; Tarui Tokichi; Odera Kenkichi

目 录

| | |
|------------------------------------------------|-----|
| 摘 要 | I |
| Abstract | III |
| 目 录 | V |
| 引 言 | 1 |
|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 |
| (二) 学术史回顾 | 2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2 |
| 2. 国外研究现状 | 4 |
| (三) 研究方法 | 7 |
| 一、“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的背景 | 8 |
| (一) 鸦片战争与传统“华夷秩序”的崩溃 | 8 |
| 1. 传统“华夷秩序”的演进 | 8 |
| 2. 传统“华夷秩序”的衰落与崩溃 | 10 |
| (二) 明治维新与日本式华夷秩序观的挑战 | 11 |
| 二、幕末维新时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发轫——以胜海舟为代表 | 13 |
| (一)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背景 | 13 |
| 1. 胜海舟其人 | 13 |
| 2.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背景 | 13 |
| 3.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的理论来源 | 14 |
| (二)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内容与实践 | 15 |
| 1.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内容 | 15 |
| 2.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实践 | 18 |
| (三)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失败原因 | 18 |
| 三、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扩张化的出现——以樽井藤吉 为代表 | 20 |
| (一) 樽井藤吉与《大东合邦论》 | 20 |
| 1. 樽井藤吉及《大东合邦论》 | 20 |
| 2. 兴亚论与脱亚论 | 20 |
| (二) 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思想的概念定型及其理论发展 | 21 |
| 1. 与朝鲜合邦的基础 | 21 |
| 2. 与中国合纵的必然 | 25 |
| (三) 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的内涵 | 27 |
| 四、一战后“亚洲同盟论”思想质变化的出现——以小寺谦吉为代表 | 28 |
| (一) “大亚细亚主义论”产生的背景 | 28 |
| 1. 一战后日本的窘境 | 28 |
| 2. 人种的偏见：“黄祸论” | 29 |
| (二) “大亚细亚主义论”的理论构建 | 30 |
| 1. 对中国的现状的分析 | 30 |
| 2. 对华政策：“支那保全改造论” | 34 |
| (三)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的内涵 | 37 |

| | |
|-----------------------------|----|
| 五、“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内涵与思考 | 39 |
| （一）“亚洲同盟论”的内涵 | 39 |
| （二）对“亚洲同盟论”思想的思考 | 40 |
| 1.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思想失败的必然性 | 40 |
| 2.实现“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可能性 | 41 |
| 结 论 | 43 |
| 参考文献 | 44 |
| 后 记 | 47 |

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以新航路开辟为标志，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亚洲”作为一个区域地理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生。在 19 世纪以前，亚洲一直存在一个以中国为统治中心的中华文明圈包围着的体系，关于这个体系，国内外学者将其描述为“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前近代东亚体系”等多种观点。凭借着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中国始终处于该体系的中心位，日本自汉代纳入这一体系，但始终与这一体系保持若即若离又相对独立的关系。

17 世纪，在亚洲内部发生巨大变动，中国完成了明清的转型，日本也基本建立了幕藩体制。此时，西方势力的入侵对原有传统的“华夷秩序”尚未构成威胁，直到 19 世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传统的“华夷秩序”面临着西方的严峻挑战。中国从“华夷秩序”的顶端跌落神坛，在这场东西方的较量中，最终以《南京条约》的签订惨淡收场。日本，这个位于亚洲东南隅的岛国，同样在西方的洋枪炮火下打开尘封 200 余年的国门。中国的迅速衰落与传统“华夷秩序”的崩溃引发日本学者关注，在此处境之下，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思考自身命运，在民间产生了“亚洲连带论”、“亚洲一体论”、“大东合邦论”、“亚洲主义”等探讨亚洲生死存亡的思想。由此可见，在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之下，日本逐渐出现亚洲国家一衣带水，团结协作的同盟思想。结盟可以说是国与国之间外交关系的一种常见手段，在日本的对外关系发展上，更是将对外同盟的方式应用的淋漓尽致，那么这种同盟思想的发轫与演变又是如何？同盟的内涵又是什么？同盟的背后又存在什么样的目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进行思考。

21 世纪以来，亚洲经济快速发展，区域一体化潮流汹涌，构建“亚洲共同体”成为地域文明建设的风向标。地理位置相近，相似的文化传统是亚洲国家合作的先天优势。日本作为我国近邻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在 19 世纪就已提出以亚洲为区域背景的结盟思想，更是借亚洲同盟思想使其对外侵略扩张正当化，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基础，给亚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此在提到日本的亚洲同盟思想，就不免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使构建“亚洲共同体”产生难以逾越的历史阻碍。如何在新的环境下推动区域一体化，构建新的共同体是所有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在构建新共同体的同时极力去消除曾经日本亚洲同盟思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近代日本对于亚洲的错误解读与打着亚洲复兴的幌子而制定的侵略战略以及在战后对于历史问题的处理态度，一直使得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燃忧心忡忡。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不断推进亚洲区域合作势在必行，那么探究近代日本的亚洲观以及其蕴含的区域合作的思想不仅对于日本建立一个正确的亚洲认识，也对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对于日本以亚洲为大环境构建的同盟理论的梳理存在必要性和研究意义。本文将对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论”思想的演变进行研究，力图探究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思想为何成为后期日本右翼势力侵略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挡箭牌。

（二）学术史回顾

目前，学界关于“亚洲同盟论”相关研究成果多见于早期亚细亚主义思想研究的相关著作中。伴随着中日交往的逐渐密切，该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亚洲同盟论”思想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成果颇丰，现从国内外角度对研究现状进行简述。

1.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大多在研究日本“亚细亚主义”思想中对“亚洲同盟”思想略有涉及，而专门对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思想进行论述的著作仍为少数。因此，对于“亚洲同盟论”思想进行探究就不能跳脱“亚细亚主义”的研究。

首先，是相关日本“亚细亚主义”的著作。王屏的《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①是研究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一部综合性专著。该书将“亚细亚主义”创造性的划分为作为“思想”的亚细亚主义，作为“行动”的亚细亚主义，作为“外交战略”的亚细亚主义。王屏认为在整个亚细亚主义的发展史中，既有反抗列强、亚洲联合的理想亚洲主义，又有与列强共同侵略亚洲的现实亚洲主义。在该书中的亚细亚主义的第一阶段“古典亚细亚主义”中曾介绍相关“亚洲联合”的思想，王屏认为这种“亚洲联合”思想主要存在于民间，并在甲午战后逐渐消失。史桂芳的《东亚联盟论研究》^②与《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③也是研究东亚同盟思想的力作。在其《东亚联盟论研究》中对东亚联盟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东亚联盟的基本内容及实质、东亚联盟论与日本侵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在《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中则是系统的介绍了东亚联盟论形成的条件及原因，寻求东亚联盟论与日伪东亚联盟运动之间的联系，力图揭露汪伪政权的虚伪性，认为东亚联盟论思想指导了汪伪政权在思想上控制中国人。此外，张景全《日本对外结盟研究》^④中突破日本结盟的个案研究传统，以日本结盟为整体来探讨日本对外长期结盟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本书从长时段对日本结盟进行研究，对于早期的与亚洲国家结盟仅是略有涉及。

其次，是相关“亚细亚主义”的期刊论文。关于“亚细亚主义”的相关论文可谓汗牛充栋。包霞琴指出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经历了从“脱亚”到“入亚”的复杂过程。且日本的亚洲主义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日本及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⑤王向远认为不论是“大东合邦”、“亚洲一体”还是“大亚细亚主义”本质上都是殖民主义，都是力图通过“亚洲联合”的谎言来实现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⑥潘吉玲的《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和伦理》^⑦中认为在复杂的亚细亚主义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一贯的内在逻辑，即使亚细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侵略本质是一以贯之的。刘江永在《历史教训与 21 世纪的东亚合作——论日本近代亚洲观的

^①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

^② 史桂芳：《东亚联盟论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③ 史桂芳：《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 年。

^④ 张景全：《日本对外结盟研究》，北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⑤ 包霞琴：《从“脱亚”、“入亚”看日本的亚洲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2 期。

^⑥ 王向远：《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一种形态》，《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⑦ 潘吉玲：《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和伦理》，《日本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变迁》^①中对“脱亚论”、“大亚细亚主义”、“亚洲门罗主义”等思潮进行细致的分析，刘江永认为中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而提出的亚洲主义思想，而日本则是立足于侵略扩张，并指出亚洲主义思想与“大东亚共荣圈”关系紧密。

此外，盛邦和、戚其章等人也对亚细亚主义进行探讨。盛邦和先生认为“日本亚洲主义”有着其内在的发展演变逻辑，起初表现为“亚洲同盟论”的联合思想，逐渐演变为文化亚洲的观点，最终成为日本侵略思想的奠基石。盛邦和认为“大亚细亚主义”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已经产生了，只不过甲午战争是“大亚细亚主义”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②戚其章则是对该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大亚细亚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以后，不存在任何的积极因素，是日本侵略亚洲并走向殖民扩张之路的指导思想。^③针对大亚细主义是否发生变质的问题，杨栋梁、王美平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诞生之初就可细化分为朴素型亚洲主义、策略型亚洲主义、征服型亚洲三种类型，以甲午战争为界，朴素型亚洲主义在急速扩张的日本缺少生存空间逐渐湮没，而征服型的亚洲主义符合政府的扩张需求则逐渐占据主流。^④翟新认为在甲午战后日本亚洲主义虽然名称更迭频繁，但是其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从未改变。且日本亚洲主义始终在日本官方意识形态中不占据主导地位，多产生于日本民间。^⑤刘峰也对日本亚洲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在亚洲主义的最初萌发期，主流思想与核心特征并不明确，直到甲午战争后形成了“日本盟主论”，其主流思想最终定型，并呈现出一种对外扩张，殖民侵略的本质特征。^⑥并且在一战后，亚洲主义进一步成熟，虽然表现形式多样，但本质上都是共通的，都是一切以日本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外进行扩张的侵略理论，并最终成为日本侵略思想的一部分。^⑦章益国也认为日本亚洲主义出现初期就是针对西方侵略的“亚洲同盟”，但是伴随着日本国力的提升，日本的大国意识与优越感不断激增，日本亚洲主义最终发生质变，并成为日本侵略思想“大陆政策”的思想源头。^⑧

在学位论文方面，张弛的《日本兴亚会研究》^⑨选取了早期亚细亚主义中兴亚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文中对兴亚会的建立、活动、性质以及对于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论述，作者认为兴亚会名为“兴亚”，实为“侵亚”，背离了起初建立的目的，不能真正实现亚洲复兴的根本目标。

陈鹏飞《中日亚洲主义思潮的主流学派之比较》^⑩一文将中日亚洲主义思潮进行比较性研究，并从两国国情、整体实力、传统文化等角度分析中日形成不同亚洲主义思想的原因。作者认为日本的亚洲主义是打着“亚洲联合”的幌子

^① 刘江永：《历史教训与 21 世纪的东亚合作——论日本近代亚洲观的变迁》，《亚非纵横》，2006 年第 2 期。

^② 盛邦和：《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

^③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④ 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日本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⑤ 翟新：《甲午战后日本亚洲主义演变的两个特征》，《安徽史学》，2014 年第 4 期。

^⑥ 刘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⑦ 刘峰：《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亚洲主义的理论与行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⑧ 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社会科学家》，2006 年 3 月。

^⑨ 张弛：《日本兴亚会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

^⑩ 陈鹏飞：《中日亚洲主义思潮的主流学派之比较》，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年。

对外实行侵略，而中国则是追求正当的独立与主权，两者的亚洲主义思潮具有本质性区别。

李悦如《东亚视野下的中日联合论研究》^①中将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的中日两国的“中日联合论”进行梳理，深入分析在面临西方侵略时中日两国提出的联合主张的根本目的，指出虽然“中日联合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亚洲主义的研究既有从整体对亚洲主义进行梳理分析，也有具体对于某一时段、某一代表人物的亚洲主义思想进行分析。总体而言，对于“亚洲同盟论”思想的研究也多是在探究早期亚细亚主义之中略有涉及。

2. 国外研究现状

与“亚洲同盟思想”及“亚细亚主义”思想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于日本学界。相较于中国，日本对于“亚细亚主义”研究起步更早，研究也更为细致充分，关于“亚细亚主义”思想的讨论至今尚未停止，但多数日本学者也是在研究“亚细亚主义”的过程中对“亚洲同盟”思想稍有涉及。

由于西方列强入侵，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如何思考国家的生存发展问题成为最为急迫的问题，于是在当时日本国内出现亚洲同盟，共抗西洋的声音，较早提出“亚洲同盟论”的是日本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胜海舟。因此，对于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是为关注重点。在原始史料方面，可以通过胜海舟的日记以及著作对于其“亚洲同盟论”思想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松浦玲是研究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重要学者，其认为胜海舟主张亚洲同盟，反对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力倡亚洲联合，共抗西洋，可以说是幕末时期提倡亚洲联合的重要人物，其思想对于后来的兴亚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影响。^②19 世纪 90 年代，樽井藤吉发表《大东合邦论》^③，再一次提出“亚洲同盟论”的思想，主张日本与中国“合纵”，与朝鲜“合邦”，最终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大东合邦”，使东亚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大东合邦论》出版约十年以后，日本近代美术学家冈仓天心先后出版了《东亚的觉醒》^④《东洋的理想》^⑤两书，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冈仓天心表达了其观点，他认为西洋人最终都要称霸世界，亚洲只有走向联合才能保持独立，不被西洋吞并，所以亚洲的统一即为东洋的理想，纵观整个亚洲，其认为能够担负起亚洲联合的重要任务的只有日本，而中国、朝鲜由于西洋的入侵、农民暴动已经将东洋传统损失殆尽，保留最优秀的东洋文化传统的只有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为唯一保留优秀东洋文明的博物馆，也只有日本才能承担亚洲联合中盟主的地位。日本大正年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愈发明显，此时日本学界再次出现了“亚洲同盟论”的思想，此时的“亚洲同盟论”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更多地表现出对外侵略的本质，例如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⑥就是研究“亚洲同盟论”思想发生质变化的代表作，小寺谦吉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全方面的

^① 李悦如：《东亚视野下的中日联合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② 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78 年。

^③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 年。

^④ 岡倉天心：《岡倉天心全集》（《東洋の理想》），《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卷 7，東京：筑摩書房，1976 年。

^⑤ 岡倉天心：《岡倉天心全集》（《日本の覺醒》），《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卷 7，東京：筑摩書房，1976 年。

^⑥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 年。

分析,得出中国已病入膏肓的结论,极力主张中国放弃外藩,并由日本对中国内地十八省进行改造,最终实现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

中平亮的《大亚细亚主义》^①也是研究亚细亚主义的重要代表作。中平亮认为目前的地球约九成被白人占领,现在的世界是白人的世界,亚洲人必须寻求发展的新通路。目前的东亚世界只有日本没有因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陷入困境,并将西洋文明充分完全的融入了东洋文明,因此日本应当成为“东洋盟主”承担起解放复兴亚洲的任务。日本应带领亚洲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毕竟这是最快的发展之路。此外,中平亮批判当时学界只顾着模仿欧洲,而忽略亚洲本身。因此,中平亮的“大亚细亚主义”已经转变为以“日本盟主论”为出发点的亚洲主义。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界再次展开了关于“亚洲主义”的讨论。野原四郎深刻解读了亚洲主义,认为亚洲主义就是亚洲各国再面临西方列强入侵时,形成以日本为轴心的联盟。可进一步将亚洲主义细化为两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亚细亚连带论”与具有侵略色彩的“大亚细亚主义”。^②对此观点,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竹内好分析了日本国内存在的两种亚细亚主义观点,其一,在东亚的体系内,日本应坚持民主平等的原则,对于亚洲国家一视同仁,在平等基础上与亚洲各国建立联合,从而抵御西洋文明的冲击。其二,由于日本在东亚国家中率先完成现代化,日本具有承担带领亚洲走向现代化的使命与义务,只有日本才能成为亚洲联盟的盟主,才能带领亚洲复兴,共抗西洋。竹内好认为不应将亚洲主义机械地分成亚洲主义的“连带”与“侵略”两种对立的观点,他认为亚洲主义既不完全与侵略主义重合,又不完全与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重合,但是又与这些思想存在重合的部分。他认为在亚洲主义的“侵略”与“联合”两种思想中存在关联性,亚洲主义是一种趋向性,仅仅是将亚洲主义简单的分成“联合的亚洲主义”与“侵略的亚洲主义”是极其教条古板的。^③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关于亚洲主义的研究依旧方兴未艾,伴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使得日本学界将亚洲主义的研究推向了高潮。狭间直树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④一书中否定了竹内好的“亚洲主义并不具有实质内容以及在客观上可以界定的思想,而是一种倾向”的观点,狭间直树认为早期的亚洲主义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除此之外,狭间认为并不是膨胀主义中诞生了亚洲主义,更为确切的来说,应该是膨胀主义是亚洲主义的一个侧面。狭间直树指出亚洲主义与欧洲入侵相关联,那么必然包含着与欧洲对抗的一种对立思想,但也存在着与亚洲共存亡的连带思想。亚洲主义必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双重关系中形成。狭间直树将亚洲主义的发展过程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亚洲主义中的国家地位基本对等;中期变为在列强协调的框架之下,以日本为轴心;晚期则是将日本推向顶峰,一味地追求日本的利益,丧失了原有的亚洲主义的本质。此外,还有将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形成对比,进行探讨的一系列著作,如小田路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的冲突》^⑤;1996年古屋哲夫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⑥;荒野泰典的《近代

^① 中平亮:《大亜細亜主義》,東京:日本評論社,1933年。

^② 野原四郎:《アジアの歴史と思想》,東京:弘文堂,1966年。

^③ 竹内好:《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卷9,東京:築摩書房,1963年。

^④ 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⑤ 小田路泰直:《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義と日本主義の相克》,東京:柏書房,1997年。

^⑥ 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東京:緑蔭書房,1996年。

的日本与东亚》^①等相关著作都是从相当长的角度对于亚洲主义进行阶段性分析,认为亚洲主义经历了从“连带”走向侵略的过程,并将亚细亚主义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但是日本学界始终淡化亚洲主义的质变化,更多的强调亚洲主义的积极联合之意。

此外,在期刊论文方面,关于“亚洲同盟”的相关论文也多见于对于日本亚洲主义的研究。例如:福家重洋的《帝国改造的胎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国家总动员论与亚细亚主义》^②中指出在一战期间有多位学者在《大日本》杂志上发表在一战中中国仅凭一己之力难以与德军抗衡,日本必须要帮助中国制定应对的举措。因此主张日中合作,使得日本的军需品、粮食、食品自给自足成为可能,而中国也在日本的保护下能够实现自身的独立。因此,不难看出,一战时期的亚洲主义的侵略面目已经十分清晰了,所谓的日中提携,不过是将中国变成日本的物资补给站而已。

落合弘树的《从〈评论新闻〉看明治前期民间人士对亚洲的认识》^③中认为在明治时期日本民间主张始终在合作论与蔑视论中流转,但由于日本国力尚不强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对抗西方,主张亚洲合纵连横的连带论十分盛行。但是,连带论的内容也有不同的范围,既有主张国家间合作的讨论,也有构想输出民权运动的立场。其中也包含了以“文明开化”先行的日本来引导亚洲的理论。但是,只要把维持日本独立的国家利益优先放在根底上,就很容易转化为侵略论。

和田守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关于连带论和盟主论》^④中认为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经历了从“亚细亚主义连带论”向“日本盟主论”的转化,而甲午战争就是亚洲认识变化的转折点。而且由于中国国力的不断衰落,原有的宗藩关系难以维系,盟主论逐渐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综上所述,纵观中国与日本在“亚洲同盟论”思想的研究,多见于对于日本亚洲主义研究之中。总体来看,中日学界的多数学者均赞同将日本的亚洲主义大体分为联合的“亚细亚主义连带论”与侵略的“大亚细亚主义”。其中,日本亚洲主义思想发生转变的时机则是甲午战争。但是是否仅为这两类抑或是一体两面,且思想发生质变化的拐点目前仍存在争议。归纳上述成果,大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观点:其一,日本的亚洲主义中的“联合”和“侵略”两大主要特征可能是转化抑或是本身就是一体两面;其二,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认识研究多以各个时期的人物为线索,且早期的亚细亚主义观点庞杂繁多,但亚洲认识的萌芽为亚洲联合。其三,究其本质,不论是联合的“亚细亚主义连带论”抑或“日本盟主论”还是“大亚细亚主义论”都是以日本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因此成为侵略思想“大陆政策”的源头是从日本角度思考的根本选择。

^①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

^② 福家崇洋:《帝国改造の胎動:第一次大戦期日本の国家総動員論とアジア主義》,《社会科学》,2017年第47卷。

^③ 落合弘樹:《〈評論新聞〉にみる明治前期民間人のアジア認識》,《駿台史学》,2020年第170卷。

^④ 和田守:《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連帯論と盟主論について》,《政治思想研究》,2004年第4卷。

（三）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基本思路：以同盟为核心关注点，来探究在不同时期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思想的表现形式及变化，对“亚洲同盟论”思想进行客观的评估，并发现“亚洲同盟论”思想的真正本质。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

1.史料分析法。以“亚洲同盟论”为着眼点，从长时段的视野进行综合性研究，来观察亚洲同盟论的演变情况。在对大量史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对于亚洲同盟思想的认识，力求对于“亚洲同盟论”的实质进行全面地把握。

2.逻辑推理法。本论文通过对“亚洲同盟论”进行细致分析研究，寻找不同时段的代表性思想。将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融合分析进行考证，力求对“亚洲同盟论”的本质得到准确认识，争取一定程度的学术创新。

一、“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鸦片战争与传统“华夷秩序”的崩溃

1. 传统“华夷秩序”的演进

17 世纪中叶席卷欧洲 30 年战争结束之后，世界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但在此秩序建立之前东亚地区就已经存在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国际秩序，关于这一秩序，目前学界存在着称谓不同但内涵相近的多种说法。例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概括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为“中国的世界秩序”^①；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将这种国际秩序称之为“华夷秩序”^②；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这种国际秩序是在中国国内形成的以皇帝为中心的君臣秩序的扩展的“册封体制”^③；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在亚洲内部，长期以来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立的朝贡贸易体系”^④；中国学者黄枝连提出“天朝礼治体系”的概念，“在 19 世纪以前，远东地区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方式。”^⑤学者韩东育则将这一秩序称为以文化上的华夷关系、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和经济上的封贡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前近代东亚体系”^⑥。在本文中，将使用“华夷秩序”这一更为常见的说法。

华夷思想滥觞于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以农业为生的华夏族，华夏族认为周边以游牧为生的民族是落后的，于是凭借相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发达的文明程度，称其他族群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即“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⑦此时，以文明程度的高低成为划分“华”与“夷”的标准，形成了“华夷分野”之态。伴随着华夏族与周边部族的冲突与交往，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政治上的宗藩关系、经济上的封贡关系与文化上的华夷秩序为表现形式的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华夷秩序”在政治上表现为处于中原的中国是“天朝上国”，其华夏帝王为“天下共主”，中国有着教化蛮夷的责任，蛮夷有着仰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在经济上，“天朝物产丰盈，原不假外夷以通有无”，中国对外的贸易只是对外恩典，抚恤外夷的方式；在文化上，华夏是文明的中心，蛮夷要向华夏学习，摆脱陋俗。华夷秩序不同于其他的国际秩序的典型特点是，其总体上保持着相对和平的政策方向，以“德被四海”为目标，以怀柔为主，武力征服为辅作为对外的主要手段，即“送往迎

^① 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5 月。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 8 月，第 10 页。

^③ 西嶋定生：《中国の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社会》，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第 463 頁。

^④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8 页。

^⑤ 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形态论》，见《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4 页。

^⑥ 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历史研究》，2010 年第 6 期，第 128 页。

^⑦ 许慎：《说文解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

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①。通过德化与礼治，建立起“华尊夷卑”、“以华变夷”的国际秩序。

“华夷秩序”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以周天子为中心，以宗法礼乐为纽带的具有等级制的天下秩序。到了秦汉时期，华夷秩序逐渐建立起了基本的框架，秦朝建立起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为维护中原地区的稳定，其北击匈奴筑长城，南征北越设郡县，对臣服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至汉武帝时期，汉朝国力达到鼎盛，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于是四方来朝，传统的天下秩序由国内影响至国外，形成了以“册封——朝贡”为表现形式的秩序框架。隋唐时期，凭借着强大的国力、开放的民族政策、发达的物质文明，大唐帝国对于其他民族与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与极大的吸引力，各国纷纷派遣使节来朝，“华夷秩序”在隋唐时期进一步发展。朝贡——册封制度的框架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鸿胪寺作为专门处理朝贡事务的机构，使得朝贡事务日趋规范化，管理体制日趋专门化，“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②“尚舍奉御设御于太极殿，南向；藩主坐于西南，东向。守宫设次，太乐令展宫县，设举麾位于上下，鼓吹令设十二桼，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③。两宋时期，“华夷秩序”进一步充实。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宋朝统治者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中央集权，使得宋朝统治强干弱枝，在北方始终受到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掣肘，“甚至连收复辽国在 926 年吞并的燕云十六州也惨遭失败，因而不得不向辽进贡 30 万两白银、丝帛的岁币”^④。虽然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宋王朝处于守势，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高速繁荣，科技的快速发展，此时的对外交往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华夷秩序”也有了进一步的充实。公元 1279 年，蒙古族入侵中原，建立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统一王朝。这个“马背上打天下”的民族，以穷兵黩武为对外方针，四处征伐，打破了以往王朝以“礼治”为对外的原则，因而元的朝贡制度比以往任何朝代的朝贡制度都具有更强的君臣从属性，不仅重视朝贡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有藩属国对宗主国在政治上的绝对臣属。因此，元朝虽强盛一时，但以武力扩张的手段来处理华夷关系始终是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华夷秩序以“礼”为核心的原则，使得“华夷秩序”对外扩展的过程中受到阻碍。明朝时，“华夷秩序”进入鼎盛时代。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再次实现国家统一，在对外关系上，明朝初年统治者把自秦汉以来历经隋唐至宋元时代，以中国大陆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华夷秩序”臻于完善，并使之处于全盛时期。^⑤ 尤其是公元 1405 年至 1433 年，郑和率领舰队七下西洋，遍及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这一远洋航行，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只为宣扬国威，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对待外国，几乎将海上丝绸之路的邦国尽述纳入了“华夷秩序”之内，“华夷秩序”的规模和影响力空前扩大。日本学者指出，“在东亚，以明朝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秩序，其范围之大从苦夷（库页岛），经日本、琉球、吕宋（菲律宾）、东南亚各国、直到印度洋周围各国，还有包括东北亚和中国的北方以及西方各地在内的广阔地区。”^⑥明代统治者恢复以“礼”为核心的和平交往模式，使朝贡体系从一种互动模式转化演变为自觉

^① 司马哲：《中庸》第 22 章，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 年。

^②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44，《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885 页。

^③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 16，《礼乐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82 页。

^④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 年，第 97 页。

^⑤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6 期。

^⑥ 信夫三次郎：《日本外交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12 页。

的外交形式，由此便有了“华—夷”对应的“文—野”价值落差、与“宗—藩”同构的“中—边”地位落差和与“封—贡”相应的“厚—薄”丰瘠落差。^①由此观之，中国长久坚持的“华夷秩序”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华夷秩序倡导“华尊夷卑”，拒绝平等关系。其二，“华夷秩序”是一种和平开放的秩序体系，以不崇尚武力为主导原则，力倡以“礼”化夷。

2.传统“华夷秩序”的衰落与崩溃

17世纪中叶，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统一华夏，以夷狄的身份继元朝以后再次建立了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改变了传统“华夷秩序”的逻辑，引发了其他邦国对“华夏”的认同感的质疑。“华夷秩序”迎来了转折点，即由盛转衰，“明清交替，是17世纪中叶东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以致在后来的东亚格局中，无论是思想、政治、还是外交、军事，两个多世纪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几乎都与之有着或深或浅和或明或暗的关联。”^②作为夷狄入关的满清一直致力于建构中华正统的身份，淡化“华夷分野”的观念，营造“华夷一体”的氛围。满清统治者不仅积极学习传统儒家文化，而且力图去减少传统“华夷之辨”造成满汉民族文化与心理上的文化隔阂。尽管如此，“小中华”意识^③、“日本式华夷秩序”等现象都可以宣告以满清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走向衰落。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出现动摇，“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所构成”^④，这也就让传统的“华夷尊卑”的内涵出现了多重的结构理解。

那么“华夷秩序”何时崩溃的呢？笔者认为“华夷秩序”自16世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就开始出现了崩溃的预兆。这种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的新的文化模式的入侵不仅仅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了瓦解，更是动摇了延续多年的传统“华夷秩序”体系的基础，即华夏民族的文化优越感。但由于传统华夷观与长久的闭关锁国的影响，中国直到19世纪初嘉庆年间修的《大清会典》仍然把西方各国如英、荷、意、葡看作是自己的“朝贡国”^⑤，对“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⑥可见此时的晚清统治者依旧“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魅魍”^⑦。然而，事实上，晚清之时，清朝对于其藩属国的控制力就已经衰退了，此时以满清王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只是中国自己的美梦，越来越多的藩属国只是将朝贡作为一种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已逐渐减少。“清朝的控制力，自乾隆时代达到顶峰，之后就趋向衰退，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朝贡次数与政治控制能力的衰退成反比而增加，这还意味着，此时的朝贡已不再是藩属国首脑仰慕‘中华帝国’皇帝‘德化’而致敬的表现”。^⑧换言之，中国的“华夷秩序”的瓦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

^① 韩东育：《东亚的生态》，《读书》，2013年第8期。

^② 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③ 小中华意识：朝鲜认为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嫡系，建州女真是夷狄，坚持自己才是东亚文化的正统传承者。

^④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⑤ 王晓秋：《19世纪东亚三国对外意识的演变和比较》，载李卓主编：《近代化过程中东亚兰国的相互认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46页。

^⑥ 魏源：《圣武记》卷12，湖南：岳麓书社，2011年2月，第378页。

^⑦ 姚莹：《康輶纪行》卷12，西藏：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91年2月。

^⑧ 信夫三次郎：《日本外交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页。

是东亚文化圈的至高点，即使“华夷秩序”的框架是依赖中国艰难维系。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天朝上国”的幻梦破碎，一直被中国视为“夷狄”的蛮貊小邦，带着比中国更加先进的武器，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入侵中国，震惊了这个在中世纪小道徜徉徘徊的天朝上国。中国的“华尊夷卑”的文化优越感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击的粉碎，传统的以“朝贡——册封”为制度框架的“华夷秩序”崩溃，中国从整个东亚文化圈的顶点跌落，开始思考何去何从。

（二）明治维新与日本式华夷秩序观的挑战

日本自汉代加入“华夷秩序”伊始，就与其他朝贡国不同，其始终游离在“华夷秩序”圈的外围，与中国保持着或近或远的距离，拥有着强烈的、力求与中国对等的意识，想要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秩序。可以认为这就是“日本式华夷秩序观”的早期萌发，例如：在公元 607 年日本遣隋使的国书中曾记载：“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①，将隋朝皇帝称之为“日没落处天子”，可见其狂妄自大，不甘于以朝贡国的身份向中国称臣，而是以想以天子的身份自居的野心。即使是在盛唐时期，日本依旧没有放弃追求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且将唐定位于邻国，而将新罗、渤海定位为藩国”^②，甚至拉拢高句丽、百济，以孤立和打击与中国唐朝结盟的新罗，可见这时日本已经开始追求与中国同等的政治权力，建筑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与唐王朝一较高下。当唐朝由盛转衰时，日本对中国的称谓由“邻国”转为“藩国”，“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③。可见日本已经对传统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华夷秩序”体系发起挑战。

“随着从中国的华夷思想与日本固有的现神思想的相结合，大约在 9 世纪后半期产生了“日本式华夷秩序”观。它以日本为中心，而大唐则变成“邻国”，新罗被称为“藩国”，东国的毛人、西国的肥人、西南诸岛的阿麻弥人统称为夷狄。如此，日本“构筑东夷小帝国”的任务完成。”^④伴随着唐朝的衰落，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随之终止，中日之间的官方的交流中断，日本致力于构筑“日本式华夷秩序”。虽然在宋元时期，日本拒绝了加入“华夷秩序”，政治上保持孤立，但是在经济上宋朝与日本之间的商贸往来从未停止，但此时中日之间的交流仅限于经济层面，日本依旧拒绝加入“华夷秩序”。长期游离在“华夷秩序”之外的日本，直到明初才再次被纳入朝贡体系，但是日本再次朝贡并不是政治上的臣属，仅仅是礼仪上的朝贡，在经济目的上的意义更强，这与明初统治者建交的初衷相差甚远，明由此与日本断绝了来往。自朱元璋以后，日本唯一一次主动、明确的以称臣的身份回归“华夷秩序”体系，就是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在结束日本南北朝分裂以后，出于维护国家统一并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积极与中国复交，向中国称臣。1402 年足利义满被明惠帝册封为“日本国王”，“兹而日本国王源道义，心存王室，怀爱君之诚，逾越波涛，遣使来朝”^⑤，足利义满给明朝统治者的回信也以“日本国王臣源”^⑥为署，以属国自居。1406 年，明成祖下诏：“日本

^① 《隋书·倭国传》，卷八一“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9 月，第 178 页。

^②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35 页。

^③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倭国日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340 页。

^④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45 页。

^⑤ 瑞溪周鳳：《善隣国宝記》卷之中，東京：光榮堂，1987 年，第 2 頁。

^⑥ 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上，東京：岩波書店，1963 年，第 208 頁。

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两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人贡用”^①，通过向中国称臣，日本不仅获取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勘合”^②，而且获得价值不菲的“赐给”。可见，“足利幕府向明朝朝贡的最大目的，就是要进行贸易。因此，为进行贸易便成了朝贡的主要动机”^③。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日本以“我国自古不向外邦称臣”^④为由再次断绝了向中国的朝贡。

室町幕府最终被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消灭，在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期，其不仅想要打破“华夷秩序”，更是想要取代中国成为“华夷秩序”的顶点。丰臣秀吉不仅仅在思想上脱离“华夷秩序”体系，更是在行动上摧毁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体系构建自己的小中华，试图建立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例如，1592年的“文禄之役”与1597年的“庆长之役”两次侵朝战争将日本野心表现的淋漓尽致，“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侵朝战争，是日本人第一次对于天朝礼治体系的挑战，也是这个体系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挑战”^⑤。当中日之间围绕朝鲜半岛的问题产生的几次大规模冲突之后，日本已成为东亚地区唯一可与大陆政权进行公开对抗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东亚关系体系开始从“一极卓立”向“两极对抗”的局面转移，盖非过言。^⑥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式华夷秩序大约于17世纪30年代形成”^⑦。其主要表现为：1636年朝鲜来使的名称由“答聘使”恢复为“通信使”，“1636年，朝鲜为向日本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祝贺升平而派遣使节来航，才恢复旧例，称通信使。从1607年派来答聘使至幕府末期的两个半世纪，来自朝鲜的使节有三次答聘使，九次是通信使，共计十二次”。^⑧在与朝鲜方面的外交国书上，废止以往使用的明朝国号，改用日本的年号纪年，并要求将日本国王的称呼改为“日本国大君”。日本认为中国的干支纪年法是册封体制的糟粕，故将其取缔。不仅如此，还将日本将军与朝鲜国王地位对等，试图人为地强加高下等级关系于朝鲜，强硬地将朝鲜纳入“日本式的华夷秩序”中。日本对于琉球的控制也彰显了其谋求与中国地位对等的愿望。琉球本是中国的藩属国，但日本对于琉球的武力入侵使琉球不仅仅是明朝的属国，又是幕府的藩国。日本对于琉球和朝鲜的控制，恰恰反映了日本仿照中国的“华夷秩序”炮制了自己的朝贡体系，以此来对抗中国，“朝鲜与琉球的双边朝贡的局面显示，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日两极构造，已初具雏形。”^⑨至此，在“华夷秩序”外游离多年的日本，正式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新秩序，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开始动摇。

^① 张廷玉编：《明史》卷322，《外国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47页。

^② 勘合：核对，中国给日本允许贸易的凭证。

^③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9页。

^④ 汪向荣编：《〈明史·日本传〉笺注》，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208页。

^⑤ 黄枝连：《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关系形态论》，见《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1页。

^⑥ 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39页。

^⑦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33页。

^⑧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⑨ 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45页。

二、幕末维新时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发轫——以胜海舟为代表

（一）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背景

1. 胜海舟其人

胜海舟，又称胜麟太郎或胜安房，号海舟，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幕府海军的创始人。从贫穷的旗本成长为幕府海军创立者的海舟一生动荡。胜家原本家境殷实，但是胜海舟十七岁时家道中落，于是生活艰难。其少年时代热衷学习剑术，曾受教于岛田虎之助，从而意识到胆识对于修习剑术的重要性，此后剑术大有精进。除此之外，岛田虎之助指导胜海舟学习西洋的兵学与技术，认为西方的枪炮技术比日本传统的剑术更加先进，学习西学非常有必要性。海舟遂有志于学习西洋兵学和炮术，开始学习兰学。在兰学兴盛时期，拜永井青崖为师，学习兰学。1850年在西町开设私塾，宣讲兰学和兵术。

1853年佩里来航后胜海舟向幕府政府上书，并提交《海防意见书》，得到幕府政府的重视，并进行相关西洋书籍的翻译工作。翌年入长崎海军传习所^①学习，也成为长崎海军传习所的第一批优秀学员，在传习所内胜海舟对于西洋文明与亚洲形势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一步开阔了眼界。1856年回江户任军舰操练所教导主任。1860年熟悉航海知识的胜海舟临危受命，任遣美使节团的随行舰队“咸临丸”号舰长，横渡太平洋，用37天时间到达美国，并顺利回到日本。这一段航行中，胜海舟对于西方制度与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更加坚定了其改革日本的信念。回国后任军舰奉行，致力于海军振兴。奉将军德川家茂之命，1864年胜海舟在神户建立海军操练所，培养幕府和各藩海军人材，建立幕府海军。1868年戊辰战争时历任海军奉行、陆军总裁、军事总裁，建议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旧幕府顺应大势，对朝廷东征军献城投降，作为幕府的全权代表与政府军参谋西乡隆盛进行和平谈判，为实现江户和平开城立下重要功绩，是江户幕府开明幕府的代表人物。维新以后，为日本近代海军的创设作出重要贡献，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海军的缔造者。

除了是日本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胜海舟也是较早提出“亚洲同盟论”的思想家，“他是幕末以来有理有据的亚细亚同盟论者，继续维持着东亚三国的团结与稳定以来抵抗欧美侵略，没有与清朝对立，置身欧美一方的思想”^②。

2.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背景

“每一艘船均有桅杆三支，桅杆直上云霄，远高于近海之山冈，大炮亦不断发射，其声如百雷其鸣，响彻天地之间，致使附近老人跪地求饶，不敢外出。”^③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来到日本江户湾，继中国以后，日本成为东亚地

^① 1855年，江户幕府聘请荷兰海军教官团创办的日本第一所近代海军教育机构。

^② 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第158頁。

^③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2頁。

区又一个被迫打开锁国大门的国家，西欧的冲击给日本发展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尽快确立能够对抗西欧冲击的政策。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得日本国内的“尊王攘夷”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尊王攘夷”运动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反对封建幕府的政治运动。毫无疑问，“尊王”即进一步加强日本天皇的权威，但“攘夷”在日本国内产生了争端，究竟是西方列强为夷，还是除日本以外其他国家均为夷，成为了争论点。于是伴随着西方势力的强势入侵以及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兴起，如何避免沦为与中国同样的境地，成为日本思想家的共同课题。佐藤信渊是当时“攘夷派”代表性人物，在 1823 年的《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佐藤信渊集中表达了其关于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张。他主张：“日本是世界之根本”，“使万国之君主皆为日本之臣仆”，因而其提出了“混同宇内”的对策，将与日本临近的朝鲜、中国关东地区作为首要的吞并对象，“皇国即万国之根本，关东即皇国之根本。其根坚固，枝叶益繁盛。既论其数，八州土著人民其数六百万余人，其食物、衣物亦悉有余，此六百余万人之中，其数即为强壮，其数即为多者，其数即为招募大军，其数即为雄兵二十万人”^①，“支那与皇国相邻而接，然尽其全国之力经略之，则无可以加害皇国之策”^②，继而妄图征服全世界。佐藤信渊将日本的视野从国内跳脱出来，将野心扩展至全世界，让人震惊，“19 世纪 20 年代，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蕞尔小国，佐藤信渊竟然有胆量发出以灭亡中国为拯救日本的‘秘策’，竟然会作出如此狂妄的政治构想。”^③佐藤信渊在世时，其思想影响并不大。但明治维新以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十分重视其思想，并提出“征韩论”的对外主张。

3.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的理论来源

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威逼，与主张“征韩论”不同，胜海舟提出了基于亚洲地缘，建立在东洋与西洋对立框架之下的“亚洲同盟论”。胜海舟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经敏感地捕捉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当中国衰落之时就开始了思考日本的生存问题，认为“近日清英鸦片之事，泱泱大国，终无力自守，前车之覆，足以为戒”^④，将清朝作为反面教材，告诫日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可再闭关自守。佩里来航后，胜海舟已经深刻意识到联合亚洲，共建海军，抵抗外辱，实现欧洲复兴的重要性，故而提出“亚洲同盟论”的思想。横井小楠和佐久间象山是幕末日本开国思想的先驱，其思想也是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理论基础。佐久间象山主张军事霸权，强调日本如果不想沦为与中国一样的处境，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力，积蓄力量，才可以在世界上处于不败之地，“强盛国力之事，是目前最为当务之急之事”^⑤。因此，他多次上书，主张“全力制造火器，只要一两年，便可以制造许多火器”^⑥，力倡学习西方科技，研制大炮，建立海军，发展海防，从而使日本具有向世界扩展的军事实力。虽然提出海防论，但当时的时代与形式并没有让他形成具体的方案，并进行实践，但佐久间象山的思想为近代日本的发展提供了大力发展军事的路径。与佐久间象山强调军事斗争不同，

^① 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 45》，东京：岩波书店，1971 年，第 448 页。

^② 同上，第 451 页。

^③ 严绍：《幕末的“宇内混同说”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研究》，《日本学刊》，1997 年第 1 期。

^④ 江藤淳、松浦玲：《胜海舟全集 2》，东京：访谈社，1972 年，第六页。

^⑤ 佐久间象山：《海防に関する藩主宛上書》，《日本思想大系 55》，东京：岩波书店，1971 年，第 279 页。

^⑥ 同上，第 278 页。

横井小楠倡导各国之间平等交往，互通贸易，从而建立一个“大同”社会。他认为“今日宇内之势，轮船问世，天涯如同邻里之间，已然形成了相互交通之形势。”^①横井小楠从不否认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军事斗争，但他认为伴随着国际交往的逐渐深入，通过军事斗争的方式获取利益远远没有通过贸易更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正是如此，横井小楠认为“万国一体，四海皆兄弟”，互通贸易才是大势^②，他以世界性的视野来思考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存亡问题，反对将日本从世界诸国中跳脱出来，“总的来说，存在亲疏有别，但华夷之间并无区别，都是人类，通过相互贸易获得利益才是大利”^③。横井小楠通过分析中英鸦片战争，深知西方势力的强大与日本的落后，因而其反对日本对外发动侵略，强调日本对外发动军事扩张，只是在自招祸患。而且其提出“支那为日本唇齿之国，然而其覆辙已在眼前，齿已寒矣，日本已不能坐视旁观”，^④“亚洲一体”的观点已经初见端倪。面对西方的侵略，以及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的沦陷，佐久间象山与横井小楠提出了两种策略，但其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察万国之国情，利用经纶之道，以实现政教一新、富国强兵，以御外侮”^⑤的目的。胜海舟将佐久间象山的“军事海防”与横井小楠的“贸易联合”的主张联合起来，形成了其“亚洲同盟论”的思想。

（二）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内容与实践

1.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内容

1853年美国舰队来航后，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剧烈震荡，在全国掀起了“攘夷”还是“开国”的争论。受此事件的影响，幕府从国内广泛征求建议，胜海舟也向幕府提出意见书，即《海防意见书》，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就萌芽于1853年佩里来航之际，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其一，海防论是“亚洲同盟论”的核心，佩里来航事件给了胜海舟巨大的刺激，他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绝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要立即采取行动，强国御辱。深刻分析中英鸦片战争中，正是由于清朝的盲目自大，不了解西方的科技水平，才会与西方的军事战争中，只能屈服。由此，海舟明确指出，西方军舰为何能够轻松进入江户湾，本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日本与西方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建设海防，发展军事是当务之急。首先，胜海舟指出幕府的传统兵法与旧式枪炮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本邦的枪法兵制依旧原始，军备废弛，实用性低”^⑥，因而海舟强调当务之急就是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即“海军军备的关键就在于建造军舰，这是天下之通论”，“没有坚船利炮是无法达到彻底抵御外敌的目的”^⑦，“无论是军舰、蒸汽船还是大小炮，都要配备齐全”^⑧。于是针对海防胜海舟提出多条建议，其一：选拔有才能的幕府之士发展建设海军，“海军，怎样才能兴盛呢？当今最缺乏的就是人才，皇国人民，不分贵贱，要选拔获得幕府之士”^⑨。1855年胜海舟进入长崎海军传

^① 横井小楠：《沼山對話》，《日本思想大系 55》，東京：岩波書店，1971 年，第 505 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横井小楠：《国是三論》，《日本思想大系 55》，東京：岩波書店，1971 年，第 450 頁。

^⑤ 同上。

^⑥ 江藤淳、松浦玲：《勝海舟全集 2》，東京：訪談社，1972 年，第 256 頁。

^⑦ 同上。

^⑧ 勝部真長：《勝海舟全集 2》，東京：勁草書房，1979 年，第 331 頁。

^⑨ 勝部真長：《勝海舟全集 18》，東京：勁草書房，1979 年，第 4 頁。

习所，学习西方的海军技术与操练技术。1860年，海舟乘咸临丸^①到访美国，通过这些与西方的近距离接触与交流，胜海舟意识到仅仅是学习西方的技术，模仿西方建造巨型军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对军制进行变革，培养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新式人才，改革落后的军制与管理方法，才能真真切切实现海防的目的。因此，胜海舟大力培养人才，推进改革。其二，加强江户湾的防卫，海舟在分析了西方的船坚炮利后，明确指出要紧急加快对于江户湾的防卫，他主张在羽田、品川、佃岛等地安设炮台以抵御外敌入侵，“在江户湾建造坚固的台场”^②。以及在江户等地建设海军学校，训练新式海军。其三，胜海舟强调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重要性，对日本与西方的实力进行分析，并将中英战争中清朝的表现作为“反面教材”，指出日本切不可掉以轻心，闭关自守，要加快脚步学习西方的科技，建造新式军舰，蒸汽船，大炮等，来抵御西方入侵，以避免步中国的后尘。

其二，贸易联合论是“亚洲同盟论”的重要部分，既然要加强海防，就势必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建造新式军舰，加固江户湾的防护，那么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没有资金支持，所有的海防意见都是幻想，针对幕府政府资金短缺的问题，胜海舟也在《海防意见书》中提出了贸易联合的方案，“制造坚船，速定商法，以杂谷杂货运往与清国、俄罗斯、朝鲜相邻之国境，交换其各种上等物品，以开贸易。”^③由此观之，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最初的设想是贸易联合，可以视为是其“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的萌芽。胜海舟在提出贸易联合的同时，更指出如果单方面的日本向其他国家输送货物，并阻止他国货物流入日本，这样会使日本更加得利。因此，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胜海舟虽然倡导贸易联合，但海舟所倡导的贸易，并不是建立在国家之间的双向互惠、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而是日本单方面获利的不平等行为，那么“贸易”的意图要远远大于“联合”了。那么海舟的“贸易联合论”更确切的来说是一种“贸易论”。

在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最初的构想中，是包含着俄国在内的亚洲联合。但俄罗斯多次进犯日本北方边境，并于1861年强占日本对马岛以后，海舟深刻意识到该岛的重要性，此次危机由于日本的顽强抵抗与英法的介入，阻止了俄罗斯的进一步入侵，“对马岛，英法仍然存在意愿，这是压制俄罗斯西犯的对策。应该立即将该岛奉为上地、开辟良港，作为贸易之地，与朝鲜、支那广为贸易”^④。由于此事的激发，胜海舟将俄罗斯从同盟中剔除，强调与朝鲜、中国联合，抵御外敌入侵。

至于朝鲜，在文久三年，胜海舟与桂小五郎、大岛友之允进行会谈，桂小五郎、大岛友之允询问海舟对于朝鲜的意见，当时海舟称：“今晨，桂小五郎、对马藩大岛友之允同道来。论朝鲜之议，我的策略是在当今亚洲，未能有与欧洲抵抗者。亚洲规模狭小，远不及欧洲有远大之策。今应由我邦派出船舰，说服亚洲各国之主，合纵连横。”^⑤桂小五郎、对马藩大岛友之允是典型的主张征韩派，那么，通过此次会面，他们赞成了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胜海舟面对国内激进的“攘夷派”，提出了武装侵略朝鲜的另一种方案，将“征韩”转为“联合”，并努力让他们认识到，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只有亚洲联合才是最佳途径。那么，胜海舟是如何说服他们的呢，可从当时赞同海舟，并提倡征韩的对马藩尊攘派

^① 日本从荷兰购买的先进军舰。

^② 江藤淳、松浦玲：《胜海舟全集2》，东京：访谈社，1972年，第255页。

^③ 同上，第24页。

^④ 胜部真长：《胜海舟全集18》，东京：劲草书房，1979年，第4页。

^⑤ 同上，第50页。

的大岛友之允的意见书可窥见海舟的联合思想，大岛的意见书提出了具体的七条对策：“其一，修改两国交往之规则；其二，征服对方的民心；其三，破两国之禁；其四，流通我国的物产；其五，显示神州之武威勇气；其六，开辟清朝之商路；其七，大兴海军”^①。从大岛的意见书，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胜海舟的思想主张对大岛的重要影响，这一点大岛在意见书中也曾提出“当今开国富强的基础就是设立海军，海军兴起的方式就是广开财源，想要广开财源，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航海互市。朝鲜的国情与夷狄耶稣之徒不同。历来与吾国有旧交，今日与彼携手，天下人也不会起疑。至于清朝，应和亲互市深结欢心。以三国交易之余利开发海军，再以强大的海军去征服他们，这是一举两得的对策。然兴建海军并与韩清两国联手之策，皆出自于胜安房多年之构想。”^②从大岛的意见书中，海舟的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出来，通过与清朝、朝鲜进行贸易获取利润来兴建海军，再利用强大的海军去征服他们。如果说大岛的意见书是以“日本——欧洲”为对立双方的话，那么海舟的“亚洲同盟论”就是以“亚洲——欧洲”为对立双方。大岛能接纳海舟联合的思想，还是建立在征韩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征服朝鲜与以德服之和以力服之两种方式，以力服之者，不如以德服之者”^③。即从长远角度来确定“以德服之”的对策，如果失败了，再采用强硬的武装征服的方式。

那么海舟的“亚洲同盟论”究竟是平等的贸易联盟还是包装的策略武装呢？松浦玲始终认为胜海舟是不折不扣的同盟者，并无对外侵略的意味。但海舟的这种联盟真的是单纯的联合贸易，共抗西洋吗？首先，不能忽略的是海舟所倡的贸易联合并不是贸易双方平等互利，更强调的是日本获得更多的利益，是站在日本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贸易联合。其次，胜海舟强调贸易联合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海军，从海舟建设神户海军操练所可见其建立意图：“我建议，我们要扩大海军的规模，在兵库和对马岛建立海军基地，将其中一个基地置于朝鲜，然后延伸至中国，并延伸至中国，将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实现合纵连横”^④。此外，在其晚年所著的《冰川物语》中曾写道：“我在明治维新前就一直倡导将日本、朝鲜和中国联合起来的计划，我计划让日本接管朝鲜和中国的海军。”^⑤由此可见，不得不对胜海舟“亚洲同盟论”中的联合进行怀疑了，这能否是建立在国家对等的联盟来共抗西洋呢？在海舟的“亚洲同盟论”中固然存在着不同于完全的军事侵略的“亚洲联合”思想。但同样也能得出海舟的“亚洲同盟论”并不是以整个亚洲为出发点来共抗西洋的合作联盟，而是以日本的国家独立与国家利益放在优先位置的策略性的联合，抑或可以称之为“武装的经商”^⑥。井上清更是评价胜海舟的思想道：“胜海舟的意见，不外是先向朝鲜提议建交联盟，如不听从，就征服它。”^⑦因此可见，在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中包含着“联合”与“侵略”双重内涵，不过是一体两面罢了，哪个对时下更有利，就施行此法。

其三，“共建海军、研究学术”是“亚洲同盟论”的实现途径，海舟不仅仅提出了“亚洲同盟论”的构想，更提出了如何将想法付诸实践，其实现途径便是“共

① 田中彰：《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开国》，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第108-110页。

② 同上，第116页。

③ 同上，第108~109页。

④ 江藤淳、松浦玲：《幕末日记·胜海舟全集1》，东京：讲谈社，1976年，第276页。

⑤ 江藤淳、松浦玲：《永川清话·胜海舟全集21》，东京：访谈社，1973年，第250页。

⑥ 八木清治：《幕末日本的亚洲联合思想——围绕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杨栋梁，严绍盪主编《变动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⑦ 井上清著，宿久高译：《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页。

建海军、研究学术”，在其日记中曾写道：“今晨，桂小五郎、对马藩大岛友之允同道来。论朝鲜之议，我的策略是在当今亚洲，未能有与欧洲抵抗者。亚洲规模狭小，远不及欧洲有远大之策。今应由我邦派出船舰，说服亚洲各国之主，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来逃脱蹂躏。首先，先从说服朝鲜开始，而后到支那。同人，悉同意。”^①他提出通过共建海军，研究学术将“亚洲同盟论”由理论转为实践。海舟强调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威逼下，亚洲国家应该“合纵连横”，实现贸易、海军和学术的联合，以抵抗西方侵略。

2. 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实践

其四，海军局的设立是“亚洲同盟论”的实践。1864年5月，海舟创办的“神户海军操练所”的设立标志着“亚洲同盟论”思想走向成熟，松浦玲称：“可以说，神户海军操练所，是海舟这一构想之精华。”^②的确，海舟的“亚洲同盟论”的根本目的就是创建神户海军操练所，以神户为中心，联合朝鲜、中国建设联合舰队，“为了进行海军练习，欲往支那、朝鲜渡航。宜先于神户设立海军局，以从事船舶实际运转，航于上海、天津、朝鲜等地，目击其地理，洞察其人情。”^③可以说，“神户海军操练所”的创建是海舟为了实现亚洲联合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实践。但1865年海军操练所的关闭，胜海舟被罢也说明了“亚洲同盟论”最终的失败。

（三）胜海舟“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失败原因

不得不说，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相较于单纯的武力征伐还是具有进步性的，其倡导贸易联合、共建海军以抵御外敌入侵，共同寻求亚洲发展之路的思想值得思考。那么作为海舟“亚洲同盟论”的实践成果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创建仅一年就被迫关闭，海舟被罢免官职则标志了同盟思想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值得深思。

第一，神户海军操练所是幕府在神户建立的培养海军将领的机构，目的是为幕府和各藩培养人才，参与者多为尊王攘夷之士。1864年8月，长州藩士发动“禁门之变”^④，胜海舟因与长州藩志士交往甚密引发怀疑，“急命海舟东归，退居闲职，兵库之事业，全然瓦解”^⑤。由此观之，胜海舟“亚洲同盟论”失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神户操练所的学生参加倒幕运动，而海舟受到牵连被罢职，神户操练所带有反幕府倾向被关闭。但原因绝不仅仅如此，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主张亚洲国家合纵连横，共抗西洋，这与国内的攘夷派思想背道而驰。虽然大岛接受了胜海舟贸易联合、兴建海军的建议，但其根本思想依旧是以贸易联合之利去兴建海军对外征伐，以实现其攘夷的目的。所以幕府想建立的海军仅仅是幕府的海军，海舟想建立的海军是日本的海军。

第二，海舟的“亚洲同盟论”的盟主认同感问题也是其思想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建议，我们要扩大海军的规模，在兵库和对马岛建立海军基地，将

^① 勝部真長：《勝海舟全集18》，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第50頁。

^② 松浦玲：《勝海舟と幕末明治》，東京：訪談社，1973年，第26頁。

^③ 仲尾宏：《坂本竜馬と勝海舟——立憲政体と三国同盟論の先駆け》，京都：講座・人権ゆかりの地をたずねて：講演録/世界人権問題研究センター編，2004年，第131頁。

^④ 1863年的八月十八日政变中长州藩及尊皇攘夷派势力被逐出京都后，长州藩以排除会津藩主、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等人为目标，派兵进入京都，在京都市区内与幕府联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的事件。

^⑤ 勝部真長：《勝海舟全集18》，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第189頁。

其中一个基地置于朝鲜，然后延伸至中国，并延伸至中国，将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实现合纵连横”^①。由此可以看出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中是以日本为盟主而架构的思想。首先对于清朝而言，虽然在与西方的角逐中处于弱势，但是在漫长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始终是华夷秩序的顶点，现在让中国向弹丸小国日本称臣，这是天朝上国的中国万万接受不了的了。而且，以当时日本的实力而言，还不足以让中国臣服。再次就朝鲜而言，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与日本共处于朝贡秩序之下，与日本处于平等地位，如今日本成为这个同盟的盟主，朝鲜亦难以接受。因此，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以日本为盟主在亚洲地区尚缺乏认同感与向心力。

虽然胜海舟倡导联合，反对不义之战，但其同盟思想中的“侵略”意味依旧值得注意，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中“侵略”与“联合”是其思想的一体两面，但这在海舟思想中并无异同，其根本出发点都是日本国家利益。

^① 江藤淳、松浦玲：《幕末日記・勝海舟全集1》，東京：講談社，1976年，第276頁。

三、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扩张化的出现——以樽井藤吉为代表

（一）樽井藤吉与《大东合邦论》

1. 樽井藤吉及《大东合邦论》

樽井藤吉，号单芳，1850年生于奈良县的一个并不富裕的木材商家庭。1882年，樽井藤吉等人组建了日本第一个社会党——“东洋社会党”。但该政党仅维持了一年，由于与日本政府政策相抵触被取缔，樽井藤吉也因此入狱一年。出狱后积极参加日本右翼活动，策划推翻朝鲜政府。1884年受到中法战争的影响，樽井藤吉为了培养在中国活动的人才，樽井和平冈浩太郎、中江笃介等人策划在上海成立“东洋学馆”，回国后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早在组建“东洋社会党”之时，樽井藤吉就已经有了“大东合邦”的思想，并于1885年完成了初稿，但期间由于“大阪事件”^①牵连被捕入狱，初稿丢失，直到1890年再起草，全文以生硬的汉文写成，为了使朝鲜人、汉人皆通读之。1892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但在政治上少有建树。由此可见，樽井藤吉的一生起起伏伏，十分坎坷。

《大东合邦论》诞生在扩张论甚嚣尘上之时，相较于军事扩张，樽井藤吉的联合思想显得与众不同。《大东合邦论》共十六章，其主要思想主张为面对西方的入侵，日本应与朝鲜“合邦”，与中国“合纵”，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国”。与胜海舟的贸易联合不同，樽井藤吉从人种学、文明论的角度提出了亚洲联盟。樽井藤吉指出，在当今世界存在着“竞争”与“亲和”两种外交关系。欧洲由于“异族混合”故相互竞争促使其发展，而亚洲黄种人重视“亲和”，“亲和”才能实现亚洲腾飞。樽井藤吉去定义“单一种族”时，却忽略了欧洲也是“白种人”的社会，这样的双重标准，都是为了论证东亚是“同一种族”的，因而有着“合邦”的基础。樽井藤吉以后，其“单一种族”论进一步发展为“同文同种论”，成为“大亚细亚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

2. 兴亚论与脱亚论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最早接受西方文明开化的国家。由此，伴随着东亚势力的变动及西学东渐的深入，日本对于亚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19世纪中叶，面对东西方冲突的大变局，中国实力的衰落，日本国内存在着民间与政府，“脱亚”与“兴亚”的不同发展策略，虽然是看似相互矛盾的应对策略，但纵向延伸，不难看出其隐藏的一条逻辑主线，即日本对于亚洲区域秩序“中心”地位的争夺。自中国从“华夷秩序”的顶点跌落以来，日本就一直在致力于发展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不断的对中国周边的国家发起入侵，取代中国成为“华夷秩序”的中心。鸦片战争中国的战

^① 1885年（明治十八年），大井宪太郎、小林樟雄等原自由党员左派以及旧自由党“有一馆”壮士另辟政治改革蹊径，计划协助金玉均等朝鲜开化党人反攻朝鲜，渡海到朝鲜半岛举行暴动，以宪政在朝鲜建立独立政权。因中心人物之一的矾山清兵卫脱离等使事情败露，结果参与者139人在大阪及长崎被捕，31人被判有罪入狱。

败与西方的完胜，使得日本开始学习西方，并在明治维新西化后以“文明开化”之名发起对旧的“大中华”体制的结构冲击，并为调整东亚秩序下自身的地位而产生了亚洲同盟的思想，即兴亚论。但从长远来看，日本提出的亚洲联合，亚洲同盟的思想并非是站在复兴亚洲，充当文明的开化者的立场之上，其本质上是构建日本为中心的新的秩序的亚洲霸权的觊觎者。不论是“兴亚论”抑或是“脱亚论”，都不过是日本亲亚主张的一体两面罢了，没有本质的冲突。所谓的“亚洲同盟”也不过是为其侵亚意图寻找的“遮羞布”，从而使其理论具有欺骗性。“亚洲同盟论”等亚洲联合思想的出现，其现实原因就是日本依旧忌惮于中国，不便以露骨的语言直接表现出其想提升自己在华夷秩序的地位的野心。但伴随着明治维新日本国力的不断提升，对中国的试探不断增加，敬畏一点点降低，其“亚洲同盟”思想中的亚洲联合色彩在不断减弱，取代中国成为新秩序的盟主的意图显现的愈发明显，侵略性格逐渐暴露。

除了“亚洲同盟”等兴亚思想主张，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提升，中国实力的衰落，在日本国内兴起了“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并逐渐成为主流。“脱亚论”的兴起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对于中国、日本综合实力的考量，从而对结盟政策进行了调整，由结盟弱国转向结盟强国。由于中国的国力的衰落，日本逐渐认识到亚洲联合，与中国、朝鲜的联合难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反而会由于触及西方列强的利益而受到牵连，于是在思想界出现了“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就是“脱亚论”的代表者，1885年3月16日发表《脱亚论》，福泽谕吉指出“现在的欧洲文明，是文明发展的最高程度，亚洲国家多处于半开化阶段，如果能让本国文明发展起来，就要以欧洲国家为风向标”。^①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依旧是结盟之法，不过此时的结盟对象已经是西洋列强，放弃了“亚洲同盟”的策略，以“文明国”的身份宣布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旧的华夷秩序，以西洋之法对待亚洲各国，这也是日本对于现实因素的考量。“亚洲同盟论”要求日本在对待中国与朝鲜的态度上必须一视同仁，但这又与日本力图改造吞并朝鲜的现实诉求相悖。因而，“亚洲同盟”思想使得日本陷入了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之地。恰逢此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则彻底撕开了亚洲联合，文明开化的伪装，直接站在西方列强的阵营，公然提出“脱亚”，使日本以西方的角度获得了“解放亚洲”的合理性，摆脱了“华夷秩序”的束缚，利用西方列强侵略与“文明开化”的借口实现了对旧的“华夷秩序”以及“中心——边缘”的秩序观的颠覆。“脱亚论”也使得日本侵亚野心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思想的概念定型及其理论发展

1. 与朝鲜合邦的基础

首先，樽井藤吉论述了合邦的必要性。其一，亚洲各国均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强势威逼，这种威胁樽井藤吉更具象指出俄国，即“俄人亦知其不可遽逞志于欧洲，故而展力于东方”^②强调面对俄国威胁，并非只有日本一国，而是整个亚洲共存共荣的问题，因而为其“合邦”提供正当性铺垫。其二，樽井藤吉指出日本贵和，朝鲜重仁，在施政原则上两国存在共通性。因为仁和，故两国“其土唇

^① 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第148页。

^② 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东京：长陵书林，1893年，第64页。

齿，势如两轮，情与兄弟，义与朋友”^①，故而为两国缔结同盟结为合邦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其三，樽井藤吉从人种论的角度论述了合邦的必然性，其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竞争与亲和两种状态，欧洲由于异族混合故而竞争使其进步，亚洲同文同种强调亲和，“竞争场有四有者，曰体力曰智力曰财力曰势力”^②，“不同种相和以作一大势力，则不可立于生存竞争之场”^③，亚洲黄种人同文同种，只有相合才能在竞争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合为一国，协力东向，则席卷亚细亚，包举宇内”^④，这体现了樽井藤吉力图构建亚洲同盟，“大东合邦”的蓝图，从而达到抗击西洋，亚洲共荣的目的。竹内好也曾评价樽井藤吉为“理想的亚洲主义者”^⑤。

樽井藤吉虽开篇就提出了“两国亲密之情固出于天然，而不可遏也”^⑥，表面上看表现出日韩的深厚情感，但之后的正文中樽井藤吉对朝鲜的蔑视与不屑表现的淋漓尽致。首先，对于朝鲜的民族历史，樽井藤吉不止一次的对于朝鲜古老神话中的檀君表现出轻慢与不尊重的态度。要知道檀君是朝鲜神话传说中的开国者，被认为是朝鲜族古老文化的象征。因此，它就象汉族神话里的炎黄一样，在朝鲜民族中作为偶像而受到崇拜。而在樽井藤吉的笔下，“故皆假借鬼神以收各州之人心，如檀君之于朝鲜”^⑦，“其上古檀君，盖自西北国来，其子卫满亦自汉土来檀君之时，既有土人。尔来二千余年国人无自立为王者”^⑧，“夫檀君治绩邈矣”^⑨。姑且不论檀君是否是朝鲜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但是檀君是朝鲜历史的重要象征与民族情感的寄托者。樽井藤吉作为外国学者对于他国开国者随意评价已经表现出其对于朝鲜历史与文化强烈的不尊重与蔑视了。此外，樽井藤吉称“从新罗还之说，又有韩神之名，则知我纪元前，既有两国交涉之实也”，“其毛种皮肤骨骼皆同”，“记韩人归化者，不暇枚举”^⑩，除了表现出对于朝鲜上古文化的嘲讽外，还将朝鲜纳入日本神代历史之下，形成“日韩同祖”的自我逻辑。朝鲜神君无证可考，但日本神代无证自明，双重的判断标准表现出的就是樽井藤吉对于朝鲜历史文化乃至民族感的打压。

其次，樽井藤吉对于朝鲜进行了进一步的抨击称：“朝鲜宜取日本之气象，汉土之文章”，“然其国未有一大英雄震荡四邻者，亦未有一大贤哲，发明一学科者，其他器械之构造，物理之讲究，美术之精巧，技艺之秀拔，未有卓绝万国者。”^⑪以希腊相比，指出朝鲜虽与希腊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但是在成就上却远远不如希腊，难有成就。并对朝鲜难与希腊相比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朝鲜落后的最大原因就是“不自主”，樽井藤吉认为阻碍朝鲜自强的最大障碍就是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然犹事唐而后于金、于元、于明、于清唯命是从以至今日，其自主犹未发达”^⑫，其指出朝鲜难发达的主要原因就是：朝鲜亲中国而不亲日本，“自主之气象却不展者因其不亲日本而亲汉土也”^⑬，日本相较于中国而

①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2頁。

② 同上，第35頁。

③ 同上，第43頁。

④ 同上，第33頁。

⑤ 竹内好：《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卷9，東京：築摩書房，1963年。

⑥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1頁。

⑦ 同上，第29頁。

⑧ 同上，第77頁。

⑨ 同上，第78頁。

⑩ 同上，第96頁。

⑪ 同上，第76頁。

⑫ 同上，第77頁。

⑬ 同上，第78頁。

言更加自主，更加近代化。由此观之，樽井藤吉提出的朝鲜自主之路与朝鲜并无相关，完全是从中朝宗藩关系而言，强调的朝鲜自主也不过是为了让朝鲜脱离藩属关系，亲近日本。而亲近日本获得“独立自主”的终点则是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樽井藤吉提出朝鲜落后的第二点原因则是从地理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朝鲜的内河航运条件差，发展迟缓，故发展落后于西方，“故内海时期之进步，亦甚迟缓，是其国运难致其开明之第二原因也”^①。除此之外，樽井藤吉对于文禄之役、庆长之役的叙述也是颇耐人寻味，为赤裸裸的“征韩”战争进行所谓的正名，称其“丰臣之志在明，而不在朝鲜”，“苟朝鲜而守局外，中立不动则必无兵革之惨”^②。将战争的受害方指责成为过错方，正是由于朝鲜亲汉而导致的战争，更指责朝鲜由于一味地谄媚于中国，使得朝鲜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对于朝鲜亲和，故“亲睦之形而有战争之影也”^③，多么讽刺，正是由于亲和故而产生了战争。在《大东合邦论》中樽井藤吉对于列强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批判，但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却大肆美名为“文明的开化”，“亲和的举动”。这可真的是“日本在遭遇侵略危机时就以侵略者为恶者，若日本为侵略者，则并非恶”^④。可见，樽井藤吉合邦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合邦，对朝鲜而言更是一种亡国式的合邦。

除了在书中用大面积的笔墨对朝鲜的落后、“不自主”进行贬低式的描写外，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中日本扮演的是先进与解放的角色。樽井藤吉从多个角度论述日本文化优于其他，万世一系之单一民族，世界未有之国。首先，从地理角度樽井藤吉称日本“气候温和”、“人口稠密”、“资源丰富”、“山川秀美”、“四围山水，八道山河”^⑤，古之蓬莱，今之仙境；第二，从历史角度称日本“民众全从一家族出”，“皇统连绵”，^⑥充分论证日本文明先进从古至今，更强调日本文化虽来源于汉，但是“是非所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者乎”^⑦，认为日本善于学习他国优秀文化并为己用，日本文化已优于中国文化。第三，认为日本“自主”，称日本“自开国以来，不为他邦所屈者，世界万国中独我国耳”，更借史书记载“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⑧来论证与他国相比日本保留了更大的自主性，不畏不惧不献媚于强国。最后，樽井藤吉极力推崇本国的立宪政治，指出当今社会的政体除了有君主专制外，还有贵族政治、立宪政治、联邦政治等多种政体。他认为日本的立宪政治已达“尽美”，如能与朝鲜实行合邦，则做到了“尽善”^⑨。他讥讽君主专制是东方落后的根源，欧洲通过改革已经实现了文明富强，如今东方只有日本“昔时之文化，今世之开明”^⑩。不论是历史、地理、政治、文明等多个角度，樽井藤吉都论述了日本优越于亚洲其他国家，因而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亚洲联合”不完全是站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的，而是以日本为盟主，打着“文明先进”的幌子而进行的吞并式的合邦。

除了表达了对于日本的优越性认知及对朝的轻蔑认识外，樽井藤吉还论述了合邦的方法以及合邦利弊。樽井藤吉认为合邦的关键在于“其要在使各邦自主

^①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80頁。

^② 同上，第99頁。

^③ 同上，第103頁。

^④ 旗田巍：《日本人的朝鮮觀》，東京：勁草書房，1969年，第55頁。

^⑤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87～88頁。

^⑥ 同上，第88頁。

^⑦ 同上，第89頁。

^⑧ 同上，第88頁。

^⑨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4頁。

^⑩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43頁。

自治之权归于平均”^①，也就是说合邦能够稳固的关键在于合邦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独立自主之权。“如果甲邦独全其权，而乙邦不能全之，则乙邦不异亡灭”，如果合邦的一国独断专行，那么对于合邦的另一国则是灭国性的打击。因而樽井藤吉指出同为亚洲地缘的朝鲜与日本，如果“日韩合邦之事，不成于今日，则他日已无机会，观宇内大势，两国彼此对立，则为不相容也”^②，此时是合邦的最佳时机。那么正如樽井藤吉所言是主权平等的合邦吗？从后文形成的日本文化优越朝鲜文化落后的强烈反差，不难看出，在文明论、盟主论的加持之下，樽井藤吉的平等自主的合邦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不会存在任何“自治之权归于平均”的生存空间。

此外，樽井藤吉还用大量笔墨分析了日韩合邦的意义，首先其论述日韩合邦对于日本的不利之处：“一曰朝鲜贫困之国也，今敢与之合，是富者与贫者共财产之理也；二曰朝鲜文化之不洽，百工不兴，智见亦不进，今与之合，则求交于愚人之道也；三曰朝鲜接土与清俄，今与之合，则必佗日守御之费，不可不负荷也；四曰今与之合，则不可不竭我国力以导朝鲜之开明，是损我益彼；五曰朝鲜气候不顺，水旱凶歉之患，无岁不有，今与之合，则不可不救护之也；六曰朝鲜政纲要败坏，祸乱将起，今与之合，则受其祸；七曰朝鲜乏自主之气象，今与之合，则传懒惰分子也。”^③从樽井藤吉列出的七条不难看出日本在合邦中担任着“救助者”的英雄角色，对于日本的不利均是朝鲜之利，但这些不利部分是事实，还有部分则是出自于日本本身的优越感而对朝鲜产生的偏见认识。日本在合邦中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救助者，只是为了朝鲜文明开化而提出合邦。于是，樽井藤吉论述了日韩合邦对日韩两国的利处：“一曰两国合同，则减一敌国也；二曰合同致大，则为他邦所敬畏也；三曰政治最公平者，为合邦不秉公，则合同不成也；四曰两国益致亲密；五曰对马海峡之锁钥，自然巩固；六曰省公使领事之费；七曰开贸易旅行通运之便；八曰最受清俄两国之敬畏”^④。由此观之，日本并非是慈善家，樽井藤吉强调日韩合邦是双方共同的利益，而且韩国受惠更多。用大篇幅去续写日韩合邦的利弊其目的也许就是为了证明合邦是建立在其所谓的“平等自主”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合邦所带来的利益是平等共同的。樽井藤吉强调通过日韩合邦，“朝鲜国王如欲保永世之尊荣，则不如与日本合同，日本之皇统，亘古之为万世一系，此为国民忠诚之果实。日朝由此结成兄弟之谊，彼此相立，合邦之制于两国民众而言，则各奉其君，而王统则以日本国民之拥护为本，此所以使彼传于万世。”^⑤所以在樽井藤吉看来，朝鲜与日本合邦能够摆脱落后，实乃一大幸事。而且日本凭借着优秀的文化与文明，理应成为“大东国”的盟主。

综上，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正是由于西方的入侵，使得亚洲地区出现了“命运共同体”的亚洲同盟思想。但樽井藤吉的同盟思想的主要体征即强调人种论与同盟的关系，更加露骨地强调日本以盟主的身份与弱国进行同盟。以“自主平等”的合邦为借口，实质却是吞并式的合邦，暗藏在同盟背后的侵略动机绝不可忽视。换言之，樽井藤吉的连带与同盟的前提是不抵抗，这才是樽井藤吉真正的合邦之法。井上清曾评价其思想为“盟主论又顷刻变成了霸主论。”^⑥而最

^①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127頁。

^② 同上，第4頁。

^③ 同上，第119頁。

^④ 同上，第123頁。

^⑤ 同上，第126頁。

^⑥ 井上清著，宿久高译：《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3页。

终日本合邦变成了日本吞并朝鲜的现实也证实了其合邦思想的虚伪性。不得不说，在“扩张论”甚嚣尘上的时代，樽井藤吉的亚洲联合，大东合邦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樽井藤吉的思想始终过于理想化且存在矛盾，因而在日本难以产生重大影响，只能是思想届的昙花一现罢了。

2. 与中国合纵的必然

在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中国。对于中国，樽井藤吉采取的并不是“合邦”而是“合纵”的策略。其理由是“然清之致大国，素非协议以合之，而今与我东方合，使我东方参其大政，则亦不可不使汉土、鞑靼、蒙古、西藏诸邦，复其自主”^①，樽井藤吉认为中国版图过大，政治比较复杂，很难与之合邦，如果合邦的话，很难保证权利的平等，从而引发动乱。笔者认为樽井藤吉对中国提出“合纵”的策略也存在一定的现实思考，为了成功说服中国加入亚洲联盟进行的策略性的让步。首先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处于“华夷秩序”的顶点，日本朝鲜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现在让中国与朝鲜日本合邦，与朝鲜、日本处于同等地位，清政府是断断不可能接受的，合邦之策更不能成功。此外，樽井藤吉也为了朝鲜能接受“合邦”的计划，如果仅有日本与朝鲜合邦，会让朝鲜产生日本吞并朝鲜的想法，进而难以实现“大东合邦”的宏伟蓝图，如果再拉进来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这样就降低了朝鲜对于“大东合邦”的警惕性。

那么樽井藤吉说服中国的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观竞争世界之大势，则宜合亚细亚同种之友国，与异种人相竞争也。”^②同朝鲜之理，樽井藤吉认为纵观当今世界，亚洲各国一定要联合起来，共抗“异族”，再次以人种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东亚黄种人联合以抗外族的观点。如果说与朝鲜的“合邦”是吞并式的合邦，那么与中国的“合纵”则的确是存在着结盟的意味。他指出“西人称东方有海陆两强国，即日本支那是也，东亚幸有此二强国，而保我黄人种之威严，设黄种人无此二国，则彼白种人将蹂躏我亚细亚全洲，奴隶我兄弟黄人”，^③因而樽井藤吉说服中国的一大理由就是面对白种人，日本与中国同气连枝。其二，樽井藤吉认为亚洲的衰落，其中存在着丢失了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尧舜之治，周公之礼这些本是亚洲的优秀传统文化，现在却丢失殆尽。丢失了优良传统的亚洲国家只有联合才能对抗外敌，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三，“今清国与我东方合纵，而根本稳固，则虽有叛心不能起，是不劳兵而制汉族之心也”^④，樽井藤吉以满汉分心为由，挑拨满汉关系，称汉族自满族把持政权后，一直难以抑制反满兴汉之心，今日清合纵，则能实现清王朝根基之稳固。

^①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133頁。

^② 同上，第132頁。

^③ 同上，第133頁。

^④ 同上，第140頁。

合邦是以日本为主导的合邦，樽井藤吉认为对日韩两国均有利弊，从而达到其所言的“平等自主”。那么“合纵”的主导者以及对于中日两国的利弊又是什么呢？樽井藤吉首先强调了人有善恶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友有利恶友有弊，因而“汉土盛则我国受利，衰则我国受害，其盛衰兴亡影响于我”^①，中国良好的上古圣贤之道影响日本，这是益友。但据泰西者言，樽井藤吉列举了清朝的几大“罪状”：“其一，信汉土袭其例缔约而不悟为其侮辱也”。首先，樽井藤吉指出清朝是与西洋各国缔结条约丧失主权之首，对于西洋已有警戒之心，但依旧闭关自守，开亚洲丧权辱国之首；“其二，是害同种唇齿之国，亦所以自害也，清廷曩既作俑矣，而今仍如此”。第二点樽井藤吉对清朝态度进行批判，指出清人莫不在意，使得列强更加肆无忌惮，也障害了日本条约改正。“其三，香港被占，他日开其门，则鬼魅魍魉嗔目而出，被其害者，岂独清国哉”。樽井藤吉认为香港被占，受害的不仅仅只有中国，西方列强会将香港作为伏魔殿，从而整个亚洲都深受其害。“其四，若使清廷不与黑龙江州，则我国全柯太，而朝鲜亦无北境之忧”。樽井藤吉指出由于清政府将黑龙江的土地割给俄国，使得日本与朝鲜都面临着俄国的威胁，亚洲各国岌岌可危。“其五，委越于法，则彼将使安南人敌同种之国”。“其六，缅甸被英国倾吞，他日若入四州，据其天险，则汉土存亡未可知也。汉土为白人隶属，则黄人诸国岌岌乎危哉”。“其七，其间接之害延及同种之邻国”。^②据樽井藤吉列出的中国几点罪状不难看出，都是中国遭受的西方列强入侵以及不平等遭遇。虽樽井藤吉借西人之口，但明确看出其毫无同情之心，将中国一个受害方强加为过错方，站在西方的角度对中国落井下石，百般批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居高临下，难以看出这就是樽井藤吉所言的“益友”。借西人之言，樽井藤吉还指出希望中国能够自省：“一曰现今拒支那人入港者，恶其丑行如此，是支那人自作之孽也。”樽井藤吉批判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为人所不耻，均为自食其果。“二曰国内多乞丐，到处成群，遇凶荒则人相食”，此处樽井藤吉借西人之言称中国贫困，食同类之肉不如豺狼。“三曰今为胡服，为辫发”，樽井藤吉称清朝已无半点仁义道德，现如今男子吸食鸦片，女子裹足，毁孝悌，伤道德。“四曰傲慢不逊，其待外邦殊无怀柔之意”，批判中国对待外邦，傲慢无礼，从古至今。“五曰怨政府之极，遂不耻为他人隶属”，樽井藤吉称中国民众已经对国家的政府没有信任感，宁可屈服于外国也不愿服从清政府。“六曰囚拘束人之思想也，”樽井藤吉指出中国拘泥文章，固步自封，难以接受外国先进文化。“七曰乱贼不能侵轶，于是受赏进爵，乱民饱食赠遗，囊橐充满”，官府与百姓共乱谋。“八曰刑律峻酷罪及全族，听诉断狱唯以贿赂之多寡判定曲直”，批判中国司法混乱，虽严刑峻法但贪污受贿严重。

^①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66頁。

^② 同上，第68～70頁。

“九曰官民昏迷，上下畏惧，满汉相离”^①。通过樽井藤吉借西人之口列举清朝应自省的九点，樽井藤吉表面上是对清政府进行委婉的劝告，但实际上也是借西人之口对中国现状表达蔑视，只不过更加委婉而已。而且通过描写清王朝的堕落不堪，相反更加突出了日本的文明开化。那么，在中日的“合纵”策略上，以谁为主导应该就不言而喻了吧。因而，针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樽井藤吉对其提出建议。仿日本以进行文明开化。同朝鲜“合邦”同理，樽井藤吉赘述了清政府的诸多罪状与腐败无能的目的，就是让中国意识到“天朝上国”已然衰落，新的亚洲秩序在逐渐兴起。日本作为最早接受西方思想而进行文明开化的国家，理应成为这个新秩序的中心，承担起复兴整个亚洲的责任。

（三）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的内涵

通过对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进行分析，其“大东合邦论”的内涵逐渐显现。首先同盟能够建立的基础是同盟的参与者基于共同的威胁而产生的共同利益。樽井藤吉提出的“大东合邦论”的基础就是亚洲各国均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威胁，亚洲各国在面临西方威胁时面产生了共同的利益。樽井藤吉提出提出的对朝“合邦”、对中“合纵”的不同策略，则是基于中朝两国不同国力的考量。由于朝鲜弱小，樽井藤吉提出了吞并式的“合邦”之略，通过此种同盟来达到强化日本力量的意义。对于中国，虽然鸦片战争后，日本深知中国国力衰退，但由于历史认知与地缘因素，日本并没有忽视中国，而是提出了“合纵”的策略。“合纵”之策的是樽井藤吉基于对日本国力尚不能抵御外敌，中国国力虽有所衰落但始终是东亚之大国的现实因素而制定的。樽井藤吉通过对朝鲜、中国进行不同策略的论述，在他的论述中，蔑视意味比比皆是，以反衬的手法显示出日本的文明开放，理应成为整个“大东国”的盟主。虽然樽井藤吉极力想表现出其亚洲同盟的诚意，精心构筑了其合邦合纵的理论体系，但后来日本侵略朝鲜，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史实证明了其真实的意图。因而，樽井藤吉的思想实际上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而服务，施行的是一种具有“怀柔形态”的殖民主义性质的思想。

由此看来，相较于胜海舟的同盟思想，樽井藤吉联合策略更加明确，先合邦再合纵。理论基础更加清晰，以人种论使其塑造了黄种人与白种人，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同盟的目的也更加明显，通过亚洲同盟实现抵御西方列强，复兴亚洲的目的。但与此同时，樽井藤吉的同盟思想相较于胜海舟其暗藏的侵略意图也更加明显，将日本作为“亚洲同盟”的盟主的意图也更加清晰，借“合邦”之名吞并朝鲜就是力证。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中存在着亚洲联合共抗西洋的值得肯定的部分，但同时以日本文明优越为前提对朝鲜进行吞并式的“合邦”难掩其扩张化的意图，相较于武力扩张更具欺骗性与伪装性，最终还是以侵亚为其理论归着点。可以说，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理想化与现实化兼具，在扩张论甚嚣尘上的日本，难以有应用的空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也标志着其思想的破产，但其“单一种族”为同文同种提供了理论渊源，也成为后来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源头之一。

^①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長陵書林，1893年，第70～72頁。

四、一战后“亚洲同盟论”思想质变化的出现——以小寺谦吉 为代表

（一）“大亚细亚主义论”产生的背景

1. 一战后日本的窘境

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国内的“脱亚入欧”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在西方思想的主导下，日本加入了侵略中国、朝鲜的西方侵略阵营，并由此产生了与西方的利益争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与西方的利益争夺战愈演愈烈，于是在日本国内又再次兴起了亚洲同盟，联合亚洲的思想。那么，日本再次提倡亚洲同盟的理由是什么呢？值得深思。

首先，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利益争夺，自甲午战后，日本战胜了华夷秩序的中心中国后，毅然踏上了与西方列强一道的扩张之路。于是日本与西方的利益争夺愈发激烈。在一战期间，日本通过与英国同盟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既得利益，而且趁西方列强忙于一战之际，日本在中国迅速扩大市场，将自己的劣质产品倾销至中国，大发战争财，至一战结束之际，日本已取代英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国，致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三成以上均为对日贸易。^①美国与日本一样，作为一战的“暴发户”，在利益的争夺上尤为激烈，美国资本和政治势力相继进入中国东北，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形成对峙。日本在中国获得的丰厚利益引得西方国家的嫉妒，他们深感与日本相比自己在亚洲获得的利益太少了，因此西方国家对日本采取了围堵的政策。日本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忌惮之心，“日本在西方眼里，已成为了帝国主义游戏中一个过得去的参与者。”^②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各国的人口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的饱和，对于市场与原材料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纷争不断，一战便由此产生。中国作为拥有巨大市场、丰富原料及劳动力的潜在市场，自然成为西方各国争夺的热点，“列强的帝国主义集中于支那，东亚成为世界政策的焦点绝非偶然，太平洋问题的核心就是支那”^③。日本作为获得在华利益获取最为丰厚者，自然成为西方国家的眼中钉，日本的入欧政策受阻，急需寻找新的对策。

其次，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甲午中日战争日本打败曾经华夷秩序的“中心”，1904年由于在华领土之争与西方列强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展开争夺战。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于日本而言具有非同凡响的特殊意义，证明了日本已经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强国，在国际地位与认可度上都得到了提升。这也使得日本的大国意识快速膨胀，民族优越感越发浓厚。此外，在一战期间，日本经济一派繁荣景象，来自参战国的军需物资订单使得日本获取了大量利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日本的大国意识逐渐膨胀，日本优越论思想愈发明显。

^① 《日支共存の運命》，《1919年支那外国貿易概況》，《支那》，1920年10月号。

^②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西尔弗著：《现代世界体系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278页。

^③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78页。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快速发展，并开展对外扩张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但作为亚洲国家始终难得到西方国家认可，而且伴随着日本与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利益争夺，日本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处境愈发困难。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原本的“亚洲同盟论”更难令亚洲国家接受。日本“脱亚入欧”的失败使得日本陷入了东西方文明均难接受的窘境。大国意识的膨胀也使得日本再难接受与亚洲国家平起平坐，日本的优越感与民族自负使得“日本盟主论”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的“亚洲同盟论”再次发生了变化，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2.人种的偏见：“黄祸论”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历程，伴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引来了西方国家的嫉妒与忌惮，故提出了“黄祸论”^①。小寺谦吉也指出“英美之领地每不容有色人种之存。”^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强大起来，并开始逐渐力图加入西方帝国主义阵营，但西方国家始终难以认可日本，并称其“与猿猴相近的人类，或与人类相近的猿猴”^③。可以说，所谓的“脱亚入欧”不过是日本的一厢情愿。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深深让日本意识到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冷漠，也让日本认识到西方国家并没有待日本为手足，当今世界是人种竞争的世界，唯有黄种人联合才能与异种人相争。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被西方国家视为是有色人种战胜白色人种，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剧烈讨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敌视愈加深刻，认为日本是黄种人反抗西方列强的领导者。一时间，“黄祸论”甚嚣尘上，日本处境十分艰难。日本的迅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深感危机，西方国家的嫉妒与敌意向日本涌来，“对日本人种的偏见与戒备，得到了美国部分主张采取强硬措施的政治家与军事家的支持”^④。而身为黄种人的日本由于对同种人的入侵，也难获得同种人的支持，日本陷入了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进退两难。因此，日本极力推崇“人种平等”力图改变其窘境。但伴随着日本在亚洲势力的快速扩张，对于西方列强利益的威胁，“人种平等”必然只是空谈，西方人针对日本的人种歧视与忌惮只会只增不减。

一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了华盛顿体制新秩序。日本在亚洲的快速扩张引发了美国的不满，美国开始了抑制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美国认为如果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将会实现黄种人的联合，从而对美国产生威胁。此外，明治中期以后，大批赴美的日本劳工与底层白人劳动者竞争，抢夺美国就业市场，引发激烈矛盾，于是美国开始了以种族歧视为特征的排外行动，1924年美国对日本发表的“排日移民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由于美国对日本的排外行动，其他西方国家也陆续显现了排日情绪。针对西方国家对日本强烈的人种歧视，日本不甘于与其他黄色人种一样，遭受白种人的种族歧视，力倡种族平等。但是当日本的种族无差别理论始终受到西方国家的否定后，日本开始宣扬黄色人种要相互联合的理论，“我日本国，今由于内外之势，不得已与列强并驰于帝国主义之中，则于东亚和平负有维护之责。故于中国问题将作其轴干，为之盟主，以拯之于白哲人种之下，保其国土，启其文化，裕其民生，以全同文同种，唇齿

^① 黄祸论，是成形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人是威胁，白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祸论”甚嚣尘上，矛头指向中国和日本等国。

^②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18页。

^③ 德富蘇峰：《大日本膨胀论》，东京：民友社，1894年，第109页。

^④ （西德）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90页。

辅车之义。”^①于是，在抗击白种人入侵的幌子下，日本再次提出亚洲联合论，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大亚细亚主义论”的理论构建

小寺谦吉在开篇就明确指出何为大亚细亚主义，“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言以亚细亚之为亚细亚人之亚细亚”。^②其认为如何实现亚细亚主义，首先就是中国与日本的联合，然后再是整个亚洲的联合，强调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只有亚洲人联合，共抗西方侵略。小寺谦吉认为“盖太平洋者，日本之肺肝，亦美国之胃腑，两国之政治家久欲决其制海权而未由，而胜负之分将亲及乎中国政治经济之势之孰优，此理之自然不容疑者”^③，由此可见，小寺谦吉认为太平洋问题是列强竞争的中心，而中国则是太平洋竞争的中心，“而为帝国主义且其注目之标的尤在乎中国”。于是，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争夺的焦点便是中国，孰获得的中国，便将实现了在国际地位的一次重大飞跃，于是对华政策的意义相较于以往更加重要。小寺谦吉指出，“白皙人种之于东亚，往往有逞其臆测之说或诡譎之见，”^④其认为白种人对于东亚早有不轨意图，伴随着“黄祸论”的甚嚣尘上，将会逐渐演变成黄白人种的对立。其认为面对白种人的不怀好意以及强烈的种族歧视，黄种人也应当联合起来，日本凭借着人种、地理、历史、艺术等与黄种人天然的优势，天然与黄种人亲近。日本是亚洲国力最强大之国，应带领着黄种人走向复兴之路，成为“黄种人之盟主势也”，^⑤担负着维护亚洲版图的巨大责任。小寺谦吉大言不惭地称“其不得以东亚砥柱为己任，不独黄种人最强国之责任所使然。”^⑥日本是亚洲之强国，不仅仅要自己强大，更要帮助其他黄种人国家实现富强，尤其是帮助中国是第一要务。中国目前的现状已经病入膏肓，日本对中国的指导极其必要，而中国对于日本还是带有极强的敌意。小寺谦吉更是避重就轻称，亚洲正是由于有日本，才在一定程度下抵御了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才在列强的围攻之下能够得以保持独立，不被列强蚕食殆尽，如果日本成为了亚洲的盟主，黄种人的领袖，就可以“如是可护中国之领土使全，可以使其民为富强文化之民，可以同文同种唇齿辅车之谊。”^⑦为了能够使自己的理论思想站住脚，小寺谦吉不仅仅利用人种对立构成了自己“亚洲同盟”的理论框架，将日本的侵略行径轻描淡写甚至美化为“文明的开化”。将中国人民勇敢顽强抵御外来入侵只字不提，大面积的描绘中国现状的“狼狈不堪”，为日本的“亚洲同盟”提供伏笔，来论证日本对于中国的保全与改造是多么具有必要性，提出了其同盟方案“支那保全改造论”。

1.对中国的现状的分析

从亚洲外部因素论证，小寺谦吉利用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形成了自己思想的基础，面对白种人的入侵，黄种人只有联合才能处于不败之地，才能构建“亚洲人的亚洲”。从亚洲内部因素来论证，小寺谦吉则是通过梳理中国目前的现状

^①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7页。

^② 同上，第10页。

^③ 同上，第7页。

^④ 同上，第8页。

^⑤ 同上，第9页。

^⑥ 同上，第9页。

^⑦ 同上，第9页。

的艰难处境，中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个方面都存在重大危机，才致使中国四分五裂，各省督军各行其是。

首先，小寺谦吉批评中国武力溃乏，军事上一盘散沙。正是由于中国军事实力的衰弱，对内难以实现国内的统一，对外要仰列强之鼻息。小寺谦吉指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武力，才能维护国家的权利，维护国民的自由，才能使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反观中国，在陆军方面“中国陆军有新旧两式”，“以此区区兵数纵甲坚械利亦不足当老大国之干城，况旧式军之编成今犹袭用前清遗制，其兵卒之品质，将校之才艺与训练之方修炼之法，较之文明诸国军队直判若霄壤，不可同日而语。”^①指出中国在陆军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兵制老旧，新式旧式军队并行，而且武器落后，战斗力低下，完全不能与其他大国比肩。在海军方面，自甲午战后，中国的海军几乎彻底荒废，军舰船只几乎都只成摆设，“自中日战争后至今虽逾二十余年，而老大中国依然一无海军国也。”^②即使有心欲建海军军事基地，但以中国目前的穷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仅靠中国独立发展海军遥遥无期。除了在财政困难之外，中国的铁路被列强控制，国土辽阔，如不掌握铁路，难以实现对于物品与武器的运输。制造武器的困难，运输武器的困难，还不仅仅如此。武器装备的管理难以统一，中央不能实现对掌握对于地方军事的集权，地方军阀势力强大。因此，小寺谦吉称此时中国的军事现状为“中国之军人无用之长物也，何则中国军队无一兵卒惟下流庸夫而已”^③，即海陆军实力匮乏，无可有之器，无可有之兵，亦无可有之将。正是由于中国武力的缺乏，因而在内奸邪割据，对外受列强掣肘，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

其次，小寺谦吉指出中国在政治上也存在重大隐患。总的来说，中国政治方面疾患出现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三点。第一，易姓革命历史的通患；小寺谦吉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革命的传统，中国的革命分为两种，平和的革命与暴力的革命，平和的革命很少，暴力的革命则使国家更加的衰颓。小寺谦吉称与西方的民主革命力倡民主、自由、平等不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始终受到天命论的影响。天命论思想在中国统治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赋予了封建统治者统治的合理性。不论是古代的统治思想还是近代的民主革命思想，天命论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依旧借天命论一语“辛亥之乱南方革命党本部传檄内外曰，方今民气昭苏，风云决郁，天亡索虏，近在崇朝，此天亡索虏一语。”^④由于民主革命思想中天命论的存在，使得共和制下的总统也与君主制下的帝王一样，成为争夺的目标。由此，不论是中国实行君主制抑或是实行共和制，都会祸乱不停。小寺谦吉还称正是由于中国政权更迭频繁，汉族或者少数民族都曾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政权，使得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经常性的被外国征服，也就没有了同族人与异族人之分，个人英雄主义盛行，极其缺乏牺牲精神，“个人思想发达已极，牺牲精神缺而无，有亦不得已也。”^⑤小寺谦吉通过梳理中国古今历史，发现不论是以往的绿林起义还是现今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内乱必是由群贼流民开始，一呼百应，蜂拥而起。这正是由于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中国自始至终不过是一个社会团体，称不上国家。国家内也必然由于这样的历史遗风从而风雨飘摇，动乱不已。

^①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302页。

^② 同上，第305页。

^③ 同上，第308页。

^④ 同上，第325页。

^⑤ 同上，第336页。

第二，国体问题解决的困难。小寺谦吉指出中国不论是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制，都会祸乱不停，只有在日本的指导下，才能建立其适合中国复杂民族国情的制度。小寺谦吉对于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体制并不看好，他认为中国虽然在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方建立了一系列民主机构，颁布临时约法，倡导民主、自由与平等。但是中国的民主体制只是徒有其表，建立民主体制并不是单纯模仿西方建立起民主体制的框架就足够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符合国家国情的需要的选举制与政党，培养民众的政治意识与民主意识，但是这些都不是中国短期内就可以实现的。“譬如自治制度当如何施行运用，使能美满完全足以代议制之基础，选举制度当如何制定，始足以适合于国俗民情，宪法内容当如何充实，始能有十分之价值”^①，这些民主制最基础的制度建设，中国尚不能及，又怎能依靠这样不完善的政治框架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呢？小寺谦吉还强调民主国家应拥有公正的政党，反观辛亥革命后中国共和制下的政党，各政党均与各省谘议局相互勾连，无论大党小党，其根本行为准则并非维护民主共和，而是为了一己之私，甚至不知政党为何物，逐利而来，利散则走。“中国官民之中能理解共和之政理法制者，寥寥如晨星也”，^②因此小寺谦吉称辛亥革命后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懂何为民主何为共和，只是盲目的模仿西方建立民主体制，是共和制的“赝品”，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过是人心思乱趁势而起，并不是对于民主共和的渴望。中国人渴望代议制，但不知代议制为何物，当时的中国不论是理论还是现实都未能达到建立共和体制的要求，而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体制也更是毫无未来，注定风雨飘摇。既然共和体制在当时中国难以实现，那么君主制呢，对此，小寺谦吉依旧是保持否定的态度，其认为纵观中国四千年的专制体制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国的君主之位总是遭人觊觎，因而时常发生政治的颠覆，宦官乱政外戚干政等政治乱象频发，正是由于对君主权利的争夺，使得君主制下的中国时常由于政权夺利而产生政治问题。共和制使得中国祸乱频发，君主制难使中国走向繁荣而且圣明君主也很难得，国体的尚未明确，使得中国难以实现长治久安，目前对于中国而言最为急切的就是加强国家最高机关的权利，如果这不能实现，那么国内的分裂格局国外的列强侵略都无法得到解决。但是仅仅凭借当时愚昧的中国，尚未完全开化的中国，实力衰弱的中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中国不可不信赖日本，日本不得不帮扶中国，亦可谓天然之盟约”，^③只有中日联合，日本对中国进行指导与改造，才能解决中国国体上的困难。

第三，小寺谦吉指出中国政治疾患产生的第三点原因即为制度不完民族不良的问题。小寺指出，曾经的中华帝国与日本区区一岛国尚不能与之敌，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其内在原因中国定要好好反思。小寺指出中国的制度只是形式主义，没有健全国民性为基础，这样的制度，定如水中浮萍，飘渺不定。在中国的内治问题上，中国的官吏没有责任意识，封建专制下的官吏是皇帝的傀儡，地方官吏只是君主的“办事员”，辛亥革命后的官吏更只是为了自己一己之私行事，争权夺势，追逐名利。中国内政的最大隐患就是官吏的无责任感。除了地方官吏，军人亦无责任心，现如今中国军民同治，灾祸频频，但仅靠中国一己之力就实现军民分治，是十分困难的。只有通过他国的外科手术，才能解决中国在内政上的隐患。

^①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353页。

^② 同上，第358页。

^③ 同上，第383页。

再次，小寺谦吉指出民国政府的财政正值前所未有的窘迫，首先民国政府接手了一个“负债累累”的清政府，既没有清王朝留下的财产，还需要背负清廷遗留下来的巨额赔款，“然承自前清之遗物，惟有巨亿之债务，空虚之国库，杂乱之簿记而已，此外一无所得也。”^①不仅如此，民国政府要承担巨额的满清皇室的养赡费用，对列强进行相关赔偿恢复费用，内有政费外有国债以及支付官员的薪酬等等巨额费用，使民国时期的财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以出卖利权为代价获得的借款无异于饮鸩止渴。小寺指出以盐税、关税等作为抵押进行借款，造成了中国独立主权的动摇，但中国即使深知借款如同毒药，但以民国当前的财政现状而言，也只能以借款来以毒攻毒了。面对窘迫的财政现状，中国官吏依旧不忘中饱私囊之“传统”，属实可悲。小寺强调，依靠外债已经使得民国的财政走向深渊，但也并非是无药可救。对此，小寺谦吉提出了解决之策，首先当务之急就是改革中央及地方财政军事，裁撤冗官冗兵，减少冗费。除此之外，统一税收，改革币制并进行增税，使得收支平衡。但即使提出了应对之策，小寺进一步指出在军备整理、财政整理的困难，整顿币制、税制的困难，而这仅依靠中国一己之力是难以改变的，只有中日联合，日本对其指导与改造，财政的“疾患”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小寺谦吉指出中国社会的“疾患”。小寺指出与世界诸多有神教国家不同，中国只信奉拜自然教。“拜自然教使得中国社会成为有形世界之生活，而非无形世界之生活，现实之生活，而非未来之生活，”^②这也就培养了中国人重视实利的性格。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更加注重实际究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中国的家族制度，小寺评价家族制度对于中国而言，在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纲常伦理以及乡村自治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家族制度使得中国的民族性保守固执，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小寺指出家族制度在政治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最大的弊端就是中国人有家族性而无国家性，究其根本来源于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教育使官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对于普通国民的教育确是匮乏的，因此，中国的民众缺乏国民观念。小寺将中日两国进行对比，认为日本以国民为单位组成日本帝国，中国以家族为单位组成国家，因此日本国民相较于中国国民更具有国家观念，传统的家族制度不改，中国人难有爱国的国家观念。在经济方面，小寺认为中国的经济也深受家族制度之害，近代新式工厂在中国经营惨淡，其主要原因在于家族制度任人唯亲，“不问其人技能如何，专以其人之亲族关系以定取舍”^③，最终使得中国近代企业陷入发展困境。最后，在社会层面，早婚多妻大家族制度使得中国人口激增，人口增长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伴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破产，大批农民失业流亡，再加之自然灾害与巨额的战争赔款，使得中国人民处境愈加艰难。中国面临了人口增长迅速与经济发展缓慢的矛盾问题，内地人口稠密处境艰难，故大批中国人迁往海外。但即使移居外国的人口不断增加，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而且小寺谦吉称在海外移民中，亚洲人始终被排斥，因而只有中日相互提携，才能抵御外族，进一步论述其力构大亚细亚主义的必要性。但随着“二十一条”的提出，日本妄图独霸和灭亡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明显，中国对其侵略本质开始逐渐认清。^④

^①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436页。

^② 同上，第552页。

^③ 同上，第562页。

^④ 许赛锋：《人种论与一战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亚洲史》，2016年第3期，第26页。

总而言之,小寺谦吉痛批中国政治混乱、军事疲敝、社会动荡、外交上朝秦暮楚,中国已经病入膏肓了,改革迫在眉睫。小寺在《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大量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不得不说,小寺对于中国现状的认识是准确且深刻的。小寺用犀利的文笔将中国现状刻画的入木三分,通过多方学者的论述得出“中国之现状,实如前章之所述曰紊乱曰穷迫曰腐败曰糊涂曰坏败而已”^①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加以改造,中国将难以改变落后现状。但是,小寺谦吉只是片面地分析了中国,忽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步性,漠视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成果,更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同样强调亚洲自求解放的宫崎滔天对于辛亥革命却是极力称赞,他认为“如果支那彻底衰亡,那么东方各国将没有希望,如果支那能够复兴,那么东方各国将救助有望。”^②宫崎滔天将中国问题视为亚洲解放的关键问题,并将亚洲解放的使命寄托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革命充满信心。从小寺谦吉一味批评家族制度、儒家思想带来的负面作用,而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带来的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与家国纽带,可以看出小寺狭隘的民族观与对华意识。从另一角度也可看出其亚洲同盟的虚假性,其所力图建构的大亚细亚主义并非亚洲人民自求解放,而是日本以绝对的优越感改造中国,肢解中国的谎言罢了。

2.对华政策:“支那保全改造论”

小寺谦吉除了指出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外,更重要的是提出如何帮助中国摆脱困境。那么日本帮助中国的理由,小寺指出主要是两点:其一,中国的灭亡无异于为黄种人敲响丧钟,在人种竞争中,黄种人将再难获得优势。其二,一旦中国被列强分割,那么一衣带水的日本也难以存立,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中,日本的处境将是四面楚歌。小寺提出对于中国的“解救”要分成两方面,一是保全中国之领土,使中国免于被列强肢解瓜分。二是改造中国,使之富国强兵。只有“保全”与“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

首先关于领土保全,“中国领土之保全为中国解体分裂之对面语,苟无分割之说,则保全之论无由以起”。^③在日本对于中国前途有两种观点,即“中国领土分割论”与“中国领土保全论”。同样主张中日联合的中岛端就表现了“中国领土分割论者”的倾向,提出中国必将遭遇肢解分割的命运,并鼓动日本参与对中国的分割甚至独占中国。^④而小寺谦吉主张对于中国要“领土保全”,并从政治、经济、国际等角度进行分析,批判了“中国领土分割论”,阐述“领土保全”的理由。小寺认为中国目前沦落到如此境地,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小寺认为甲午战争中,中国就已经暴露了其腐败衰落之乱象,埋下了被瓜分领土的隐患。甚至企图利用三国干涉,远交近攻之略对抗日本,结果却引狼入室,开启了被瓜分的大门。其二,在战后实行了错误的经营方法和举措,以贩卖利权为代价募集外债,企图改革,结果造成中国的命运被他人掌控。总言之,小寺认为中国领土被分割的命运是自身招致的,企图利用西方远交近攻来牵制日本,结果却引狼入室,增加了中国被分割肢解的风险。小寺不仅仅将甲午战争进行美化,而且将战争的过错方转嫁至中国,不顾及中日两国民族情感,得出只有日本才能对中国进行“支那保全”的谬论。除此之外,小寺谦吉更将日俄战争称为日本为保

^①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622页。

^②伊東昭雄:《アジアと近代日本:反侵略の思想と運動》,東京:社会評論社,1990年版,第67頁。

^③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640页。

^④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東京:政教社,1912年。

全中国而作出的巨大的牺牲，“俄之南下政策，与日本之中国保全之政策，根柢上枘凿不相容者也”^①，称日本是为了保全中国才与俄国爆发了冲突，从而造成日本“日本其时死伤者达二十二万，现今所负繁重大国债，莫非为其结果所致，日本因保全中国，所受之损失，可谓之大矣”^②。小寺将中国一旦肢解对列强来说有利，而对日本而言为祸形成对立点，从而表现日本在维护“中国保全”上作出的巨大贡献，并从政治、经济、国际等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反对“中国分割论”的理由。

关于政治上的理由，小寺谦吉称从日本国防角度而言，保全中国就是在日本与列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一旦中国被列强瓜分，那么日本将处于世界列强白种人的包围圈，腹背受敌，处境艰难，国防安全难以保障。关于经济上的理由，小寺认为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人口众多，能为日本供给丰富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市场。如果中国没有被列强分割，那么日本凭借地理位置将获得优势，但一旦中国被瓜分，那么中国的原料市场都将被瓜分。因此，对于日本而言，保全中国领土维持中国市场极为必要。更重要的是，从太平洋问题的角度来看，一旦中国被瓜分，那么西方将增强了在太平洋的势力，太平洋与大西洋将再难抗衡，黄种人再难抵御白种人入侵，只有保全中国，才能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与西方列强抗衡。总而言之，小寺从认为分割中国对日本百害而无一利，日本为自身利益也要保全中国。

那么小寺想要保全的是整个中国吗？其实不然，关于保全的范围，小寺指出“所谓中国领土之保全，指中国本土并不包含藩部土地”^③。小寺认为蒙藏已经从事实上脱离了中国的控制，属于英俄的势力范围，那么也就是中国的“外藩”，中国难以对其实现保全。到此，小寺一面不断强调日本极力甚至不惜牺牲为“保全中国”作贡献，一面力劝中国已经租占的领土就不要妄想保全，这两种观点的矛盾，不过是为日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占领满洲寻找立脚点。小寺称既然满蒙已经成为日俄的势力范围了，那么中国只能接受事实，因为以中国目前的实力，自保都很困难，更何谈与日俄为敌。与其全面沦陷，不如专心于中国本土十八省的统一改造，避免外患的进一步严重。如果中国此时仍想要保全全部的领土，最后只能是一省都难以保全，不如先谋求本部十八省的统一，才是目前之大事。

综上所述，对于小寺的“领土保全”的真实面目已经十分清晰了，所谓的保全是指割让满蒙，保全中国本部十八省，是“割让式的保全”，归根到底，他的保全不过是为日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寻找借口，而他所言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也逐渐清晰，中国放弃满蒙，保全本部十八省，由日本对中国进行保全改造，从而构建大亚细亚主义社会。不难看出，小寺的亚洲同盟，黄种人联合极具欺骗性，不过是为其侵略寻找遮羞布而已。

继“保全中国”后小寺提出要对中国进行改造，小寺认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先觉者，是东亚国家的最强者，也有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任务，对于中国有传播先进文明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日本具有东西方调和的文明，而救治中国必须举东西方文明之合力，日本成为帮助中国改造的最合适国家。关于如何对中国进行改造，小寺提出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改造，从而实现中国的富强民主。

^①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653页。

^② 同上，第653页。

^③ 同上，第692页。

关于政治方面的改造，小寺指出中国在政治方面的改造首先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良腐败之政治，保障民众之生活，整顿法制。而这些仅靠中国一己之力是不够的，中国应聘日本政治军事顾问指导其改造。小寺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改造最为必要的手段，一为财力，中国只有实现经济的独立，不再依靠外债，才有了改造中国的实力。二是强制力，也就是武力。小寺认为中国并不是没有军队，而是缺乏服从中央、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军队，因此，中国需要日本的援助。小寺强调日本与西方列强不同，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援助都是不怀好意的，“而日本指导改造的目的绝非欲占中国之利权，不过欲其在我政治顾问指导之下，改良其腐败之政治”^①。小寺将对中国政治上的改造分为行政、司法两部分，指出在行政，警政以及地方行政等方面聘用日本人进行指导改造，在司法方面，制定独立的法典，并使司法保持独立性，不受行政系统的影响。

关于军事方面的改造，小寺强调为了防止内乱的发生以及减少军费的开支，应裁撤一半的军队。由日本对中国进行军事指导，并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兵器，使中日使用同一类型的兵器或者中日合建兵工厂，日本甚至会向中国提供技师以及材料等从多个方面中国帮助进行改造。在小寺谦吉的笔下，日本成为救助中国于水火的“慈善家”，“日本所以热望中国之保全及其改造者，不过欲以亚洲之繁荣和平之责任，使中国互为分担尔”^②，将日本的侵略行径美化得淋漓尽致。但事实上，小寺的理论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指导思想之一，所谓的减兵政策不过是从日本利益出发，麻痹中国，利于日本对中国进一步侵略，从而实现其“大亚细亚主义社会”。

关于经济方面的改造，“小寺指出中国目前的经济存在六项问题亟待解决，筹集资金、财政集权、整理行政、改革税制、改正关税、改革币制”^③，但这些问题仅依靠中国自身，难以解决，必须由日本对中国进行保全改造。首先关于资金援助，小寺认为中国目前除了依靠外债之外，别无他法，日本能够向中国提供资金援助，但仅凭日本一己之力，难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复兴，因此只能借助于外债，但日本定会竭尽全力保全中国之利权不被进一步掠夺。其次，小寺认为关于财政集权、行政管理以及改革税制方面，中国应聘请日本人对中国进行经济指导。除了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集权，对行政系统进行改革，裁撤多余的官吏，养成公正廉洁的官吏之风，多方面减少冗费；而且增加税收，进行税制改革力图多途径增加财政收入。关于币制改革，小寺认为整顿币制绝非中国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日本出于同文同种的民族情感以及高义的精神，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中国应全身心信赖日本对其进行改造。在小寺的笔下，日本出于侠义精神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但从“是等事业中，最有望者为埋没于地中之矿物石炭石油之发掘是也”^④中可以看出日本帮助中国的真正野心，那就是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掠夺中国资源，使中国成为日本专属的原料与市场库才是其帮助中国的真正目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改造，小寺认为教育、宗教、医疗是中国社会改造的三个主角。首先在教育改造上，日本的教育取之于西方，但符合东方的国情，因此中国向日本学习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应聘请日本人作为教育顾问，对中国教育

^①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721页。

^② 同上，第729页。

^③ 同上，第735页。

^④ 同上，第749页。

指导改造，中国应在全国普及日语及日文，使日本对中国的提携与改造更加便利，并进一步向中国传播先进的科学知识。在宗教问题上，小寺认为西方基督教并不适应中国国情，与中国传统儒教精神不能相容，而日本不同，日本佛教经中国传译到日本，其思想渊源于中国，因此能更好的与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观念相适应。在医疗问题上，小寺认为中国传统施治深受封建迷信之害，“生死由命”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日本作为先进文明国，应指导中国进行医疗改造，兴建新式医院。

至此，关于小寺谦吉的“支那保全改造论”的真正内涵已经清晰可见，所谓的“保全”是指放弃已经被租借割占的领土，保全内部十八省。所谓的“改造”则是中国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全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日本化改革”，从而丢失本民族的主心骨。那么小寺谦吉一直力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绝非他所言的“中日提携”，共建亚洲同盟，维护亚洲地区和平与安全。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真实面目就是打着“亚洲同盟”的幌子，对中国进行改造，使中国最终完全沦为日本的附庸，最终独占中国。

（三）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的内涵

通过上文对于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进行解读，已不难看出其大亚细亚主义的内涵是：面对西方国家的“黄祸论”，以种族为理论框架，实现亚洲黄种人的同盟，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为亚洲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作为亚洲曾经秩序的中心，日本作为文明开放的先觉者，要先实现联合，共同保护亚洲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并推进亚洲的复兴壮大，再进一步解放亚洲其他国家，增进亚洲国家之间的民族情感，使得黄种人真正在世界上实现种族的强大。

那么，如何实现其大亚细亚主义，构建亚洲同盟呢？小寺谦吉也提出了其具体解决方案：首先实现中日联合，进而解放整个亚洲，实现对于欧洲“黄祸论”的反击。对于中日联合，小寺谦吉提出联合之法即对中国“保全”、“改造”论，与北一辉等主张肢解中国的学者不同，小寺谦吉主张“保全中国”，其所称的领土保全即为“依靠自力不能保全领土的国家，依靠外力遏制即将灭亡的颓势，而非恢复已经丢失的东西，或者解除已经建立的主权限制”。^①也就是说，小寺谦吉主张保全中国，并非是完整的中国，而是除外藩部之外的本部十八省，至于已经列为列强的势力范围的外藩部，日本也并没有要帮助中国讨要回来的意思。至此，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的真实面目已经基本浮出水面，保全中国，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全，其所谓的帮助中国免受西方列强的瓜分，不过是其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幌子而已。小寺谦吉痛斥西方列强对黄种人的侵略行径，但是却提出中国将满蒙交于日本进行改造，美其名曰为中国解决疾患，避免国家危亡，如此双重标准让人惊呼。小寺谦吉对中国现状大肆批评，指出目前的中国如同生病的病人，仅靠自身难以实现康复，只有外国进行“手术”，才能割掉疾患，保全生命。小寺称日本则是最有资格对中国进行改造的国家，其称日本与中国同根同种，友谊长存，日本对中国进行改造是帮助中国复兴，而非像西方国家怀揣着狼子野心。而且，日本作为亚洲最强国，不仅保全了自身在西方入侵下主权的独立，而且在一战期间日本经济迅猛发展有目共睹，再加上日本优越论的影响，小寺称日本已经成为亚洲不可忽视的力量，甚至是整个亚洲的支柱，是东西方文明优秀的融合体，其成为亚洲同盟的盟主理所当然。在亚

^①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国：百城书舍，1918年，第756页。

洲帮助中国进行改造的国家也非日本莫属，只有中国真心信赖日本的改造，才能免于被列强的分化肢解。不仅如此，小寺谦吉强调日本为何要对中国进行改造，因为中国对日本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因此，日本与中国联合，对日本是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不论小寺谦吉对其“大亚细亚主义”进行何种程度的包装与美化，其中的侵略性质不言而喻。其所称的共建黄种人联合，亚洲同盟不过是为其侵略本质寻找“遮羞布”，究其“支那保全改造论”就可看出其思想的本质：中国要承认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将满蒙让于日本，并按照日本的建议对中国进行“日本式”的改造，最终实现中国与日本的联合。从小寺谦吉的论调能够看出，其虽未否认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存在，但是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否认，极大伤害了中日之间的民族情感。因此，小寺谦吉的亚洲联合也并非是中日处于同等位置的联合，而是日本帮扶中国，提携中国，日本处于亚洲同盟的盟主地位。在面对西方列强对黄种人入侵时，亚洲黄种人联合，日本成为亚洲同盟的盟主，中国则是随从日本的角色，为日本实现大亚细亚主义复兴的伟大任务提供物质资料。但是当处于同盟内时，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论”则主张以维护日本国家利益为优先，中国必须要保证日本是亚洲同盟的最大利益体。可见，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不过是为其对华侵略寻找的联合的伪装，一旦撕开丑陋的本质，就能看出联合论调下侵略的野心。李大钊早在 1917 年就指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掠夺而自为掠夺，”^①这一针见血的评论，真正撕掉了“大亚细亚主义论”的美丽外衣，露出了其侵略的本质。伴随着法西斯在日本的上台，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也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的理论渊源之一，日本逐步借“大亚细亚主义”之名，在亚洲实现快速扩张，放松亚洲人民的警惕，为侵略战争进行粉饰美化。

^①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见《李大钊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50 页。

五、“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内涵与思考

（一）“亚洲同盟论”的内涵

通过对近代亚洲同盟思想的梳理，以幕末维新、甲午海战、一战前后为三个时间点，对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三位的“亚洲同盟论”思想进行分析，“亚洲同盟思想”的内涵便逐渐显现出来。简言之，亚洲同盟思想的内涵主要包含同盟的基础，同盟的方式，以及同盟的目的三部分。

首先，同盟能够建立的基础是同盟双方具备共同的利益亦或是面临着同样的威胁。近代日本对于亚洲同盟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主要是指西方列强对于亚洲的入侵，亚洲国家共同面临西方势力的威胁，因而同盟具有必要性。正是因为有了共同的敌人，才会有构建同盟的基础。故“亚洲同盟论”在论述亚洲同盟基础时，将日本纳入亚洲的范围之内，形成了“东方——西方”的对立框架，完全忽略了日本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营造出日本无辜的氛围以及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愤慨。那么同盟的共同利益就是亚洲同盟共抗西洋，维护东亚的和平与安全和利益则是共同利益。不仅仅维护亚洲的国防安全，通过同盟实现贸易的联合，增加贸易联合对于同盟各国的增收也是同盟能实现的共同利益。当亚洲国家，如中国，实力衰落但国力尚存时，同盟之间就存在共同利益，那么同盟就能够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建立。但是当亚洲国家，例如朝鲜，国力弱小，那么日本所谓的同盟就不仅仅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同盟，而是吞并式的同盟，因为国力过于弱小，与之同盟难以实现共同抵御列强入侵的目的，还不如彻底吞并，增强日本抵御西方列强的实力，复兴亚洲，抵御外侮的任务就由日本来完成。因此，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论”是与同盟国的国力密切相关，国力的强大与否影响了日本同盟政策的判断。除此之外，“亚洲同盟论”还有一个重要的同盟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人种论。介于日本曾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径，“亚洲同盟论”始终受到亚洲国家的忌惮与怀疑，于是日本学者便利用人种论营造“东方——西方”、“黄种人——白种人”的对立框架，使联合理论受到亚洲国家的接受，日本为亚洲国家所接受。“种族主义是19世纪欧洲人看待东方时的歧视性思维之一。”^①因此，当日本遭到西方在人种上的歧视后，便将人种论逐渐引入到同盟的理论基础，使亚洲国家放下警惕，美其名曰黄种人联合，复兴亚洲，建立“亚洲人的亚洲”。

第二，关于同盟的方式。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思想伴随着多种因素与时代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同盟的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幕末维新时期，中国虽国力有所衰落，但实力尚存，那么此时日本的同盟方式为相对平等的贸易联合。但是伴随着亚洲国家，中国、朝鲜国力的不断衰落，日本发展速度加快，使得日本与中朝等亚洲国家的实力逐渐拉开距离，于是原本相对平等的贸易联合逐渐演化出现了右倾化的趋向，逐渐被吞并式的合邦而取代，其侵略色彩愈发凸显出来。同盟逐渐显现了以日本为同盟盟主的特点，如果说幕末维新时期的同盟是相对平等的同盟，侵略色彩尚未显现。那么甲午战后日本所提倡的亚洲同盟逐渐出现了日本对于他国文化、历史、民族、实力等多方面的打压，

^①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60页。

从而体现日本的先进文明与开放，为其吞并式的同盟寻找借口。一战前后，鉴于日本在西方列强屡屡碰壁，日本国内再次出现了亚洲同盟思想，但此时的亚洲同盟思想相较于以往，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侵略色彩表现了更加清晰，对于中国进行“保全改造”，其本质是避免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入侵，使亚洲成为日本的大本营。对亚洲其他国家加以改造同化，扩张日本在亚洲势力，使亚洲成为日本的亚洲。因此，此时的“亚洲同盟”已经早以不具备曾经的亚洲联合共抗西洋的进步因素，而是转化为为日本侵略亚洲提供“遮羞布”，使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与西方国家争夺利益时更具有合理性。同盟只是空谈幻想，本质是侵略扩张，这才是战后日本同盟思想的本质。

最后，关于同盟的目的。通过分析，能够清晰看出日本主张亚洲同盟的目的：既希望借亚洲同盟之力共抗西洋为国家谋得生存与发展，又意图以亚洲同盟为借口实现日本在亚洲势力的扩张，从而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而且伴随着亚洲诸多国家的衰落，日本与亚洲国家间的差距变大，其同盟中联合抵御外敌，国家间平等同盟的诉求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不断鼓吹日本优越论，日本对于亚洲国家的开化与改造。亚洲同盟论的立足点由“亚洲——欧洲”逐渐演化为“日本——欧洲”，极力将亚洲构筑为日本的“后花园”，从而使其陷入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从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理论渊源。

（二）对“亚洲同盟论”思想的思考

1. 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思想失败的必然性

幕末维新后的日本，经历了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近代日本开始逐渐以亚洲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观察近代日本出现的“亚洲同盟论”的演变，早期的亚洲联合共抗西洋，在西方列强大兵压境之时，确实起到了呼吁亚洲民族共同对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宣传作用。但不能对“亚洲同盟论”思想评价过高，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自亚洲同盟思想提出伊始，就未将尊重同盟国的主权，互惠互利纳入同盟的基本原则之中，这也注定了“亚洲同盟思想”的悲剧结局，更何谈应用于实践。在近代“亚洲同盟论”始终存在着两对矛盾：即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以及日本与亚洲国家的矛盾。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是列强间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日本与亚洲国家的矛盾是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同盟论”中强调亚洲联合共抗西洋，但始终不能将互惠平等作为同盟的立足点，不能将侵略壮大日本势力范围的野心放下，因此其“亚洲同盟论”的联合思想始终不能得到亚洲国家认可，从而终是一场幻梦，并逐渐右异化，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侵略思想的理论渊源。

初期的“亚洲同盟论”思想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国力尚且不足以应对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入侵而采取的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而且在初期的同盟思想中就可见日本的功利性，其同盟并非同盟国的利益最大化，而是日本的利益最大化。伴随着日本国力的飞速提升，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时，“亚洲同盟论”发生了改变，其思想中的右倾化开始凸显，对外侵略的色彩加强。此时的同盟思想已经逐渐显现出吞并式的同盟，从开始的反战的同盟思想开始向对外扩张的同盟思想转变，使同盟思想逐渐背离初衷。到了一战之际，面对西方列强对于日本快速发展的忌惮与嫉妒而提出的“黄祸论”，日本在西方列强的阵营中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于是日本国内再次出现了同盟思想，此时日本已经逐渐将同盟的立足点置于人种论之上，从而来淡化和模糊曾经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

略行径，放松亚洲国家的警惕。但此时的“亚洲同盟论”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此时已经完全成为扩张化的同盟，而所谓的黄种人联合共抗西洋不过是其与西方争夺亚洲势力范围的伪装，抵制西方国家而建立的同盟目的不再是共抗外辱，而是将亚洲彻底日化。所喊出的同盟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本质是“亚洲是日本的亚洲”。

从最初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到后来的“日本主义”，“亚洲同盟思想”的悲剧结局是自诞生之时就已确定的。因为“亚洲同盟论”思想存在着双重内涵，一方面它是近代日本提出亚洲联合共抗西洋的宣传语，另一方面又是日本向亚洲扩张的“遮羞布”。因此，其所谓的同盟自诞生以来就毫无诚意，毫无原则，在这样基础之上建立的“亚洲同盟”也是不可能建立的，只能是空谈罢了。除此之外，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思想注定失败还存在着多种因素的影响，日本政界的影响，日本国体论的影响，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等等。

2.实现“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论”的谎言最终以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告终。当今世界，区域集团化及多极化进一步加强。欧洲走向联合建立了欧盟，美国建立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各洲以不同的形式组织走向一体化，以洲为单位形成共同体成为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亚洲作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能否建立区域共同体深深牵动着亚洲人民的心。近代日本已经脱离亚洲近百年，对在近代对亚洲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站在了亚洲的对立面。战后也进入西方阵营，并始终以退缩、遮掩的态度对待曾经的历史问题，因而日本在亚洲的处境仍十分尴尬。当今世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如何思考亚洲问题是日本必须正视的。日本要想重新获得亚洲人民的信任，重返亚洲，实现“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经济，建立正确的亚洲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不得不说“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实现是存在现实基础的。首先，从地缘安全角度上来看。亚洲国家一衣带水、同气连枝，任何一国的生存发展遇到威胁都会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虽然，日本近代乃至现代都始终致力于加入西方阵营。但实质上，日本既没有真正加入欧洲，也不能被亚洲国家所接纳，处于孤立的位置。伴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加强，日本也在思索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发展问题。历史已经说明：和平才能实现地区的发展，以牺牲他国利益发动战争只会是自取灭亡。

第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形成会进一步推动亚洲国家经济的发展，减少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对进一步实现亚洲国家产业升级与转移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作为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而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与丰富的人力资源。由此可见，亚洲国家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进一步加强“亚洲区域一体”化对于日本而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于美国的依赖，增强自主性，也会使日本经济实现一个巨大飞跃。目前，中国在亚洲国家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大国作用，相信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对亚洲国家间展开进一步的经济贸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从文化角度来看。以汉字及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的亚洲文化圈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西方的基督教与功利主义与亚洲国家的文化不具有普适性。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增强民族责任感与社会使

命感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亚洲国家能够走向一体化的文化基础。儒家思想深深的影响了亚洲人民，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亚洲各国力倡和平与道德，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即使构建“亚洲区域一体化”存在基础，日本建立正确的亚洲观也是进一步推动亚洲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关键。

首先，日本应当树立正确的战争史观。近代日本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对亚洲国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种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即使在战后对日本进行了制裁，但是在日本国内依旧存在着不承认侵略历史的声音，篡改日本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行为激起亚洲人民对日本的极大愤怒。面对曾经的错误，至今日本也没有正视历史，始终以遮遮掩掩的态度来对待，甚至出现了诸多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想观点。日本如果想要真正回归亚洲，就要拿出面对历史的勇气与诚意，才能得到亚洲国家人民的信赖与支持，才能使得亚洲国家的人民真正放下心中的芥蒂，来推进亚洲的区域一体化。一味的坚持错误立场，只会让日本再次陷入军国主义的漩涡，带来的只会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其二，日本应树立正确的国家平等观。近代日本凭借着较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的民族优越感空前膨胀，自诩为东西方文明的优秀结合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盲目的自大与膨胀渐渐使得日本发展失去了正确方向，打着“圣战”的旗号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21世纪的日本，只有放下民族优越感，以民族平等为原则来思考国际问题，不再追求成为亚洲的主导者，才能真正得到亚洲国家的信任，进一步推动亚洲地区的经济腾飞。

其三，日本不能在东西方阵营中摇摆不定。近代日本始终在“脱亚”和“兴亚”中纠结。但不论是“脱亚”还是“兴亚”，本质上都是从日本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近代日本强调“脱亚入欧”目的是学习西方，增强自身实力。而所谓的“复兴亚洲”不过是以同盟为借口，将亚洲成为日本的“后花园”，从而实现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根本目的。如今的日本，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看，都已经站在了西方阵营一面，只有正确对待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绝不可将亚洲变成日本增强自身实力的跳板。只有正确对待亚洲国家，和平共处，互通贸易，放弃错误的霸权主义思想，才能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将亚洲发展为世界格局中最具有活力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亚洲区域一体化”的推进要求亚洲各国绝不可以仅仅只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思想失败的必然性正在于此。近代日本正是没有处理好日本本国利益与整个亚洲的利益，从而走进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死胡同。当今世界，亚洲各国只有建立正确的亚洲观，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处理好本国利益与整个亚洲利益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

结 论

近代日本亚洲同盟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亚洲，近代日本逐渐产生了同盟思想，力图通过同盟壮大自身实力实现共抗西洋的目标。其起初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意义不可否定。但是同盟诞生之初并不具备同盟的基本原则，即互惠平等，只是以日本国家利益至上为根本守则，因此亚洲同盟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并向“大陆政策”靠拢，最终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的理论渊源之一。本文以胜海舟、樽井藤吉、小寺谦吉三位学者为代表，对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论”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本文以一个相对长时间段的视角对“亚洲同盟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亚洲同盟论”思想产生于幕末之初，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日本出现了“亚洲联合，共抗西洋”的思想，由于日本此时在亚洲尚未形成绝对的优势，因此在“亚洲同盟”思想中具有浓厚的联合和反战意味。但是自甲午战争以后，同盟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化，这是由于亚洲诸多国家国力的衰弱，而日本实力的提升，因而同盟中扩张化逐渐凸显，同盟开始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借口。日本的民族优越感逐渐膨胀，提出对亚洲国家进行文明开化的改造。到了一战时期，亚洲同盟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侵略扩张的本质不再掩饰，此时的同盟只是将亚洲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同盟变成了空洞的口号和日本对外侵略的“遮羞布”，并逐渐被日本法西斯利用成为其对外扩张的工具。

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亚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实现日本快速发展的目的。近代日本主张“亚洲同盟”的本质为既想借结盟来牵制西方列强谋求本国的生存与发展，又想借结盟来为日本称霸服务。近代日本的“亚洲同盟论”思想只是将亚洲变成日本提升自身实力，从而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的跳板。其诞生之初就缺乏同盟国家平等互助的基本认识，因而悲剧的结局也是必然的。同盟国家的国力变化深刻影响了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思想的变化。当亚洲国家实力尚存时，“亚洲同盟”就是亚洲联合，共抗西洋。但是当亚洲国家开始走向衰落时或亚洲各国实力弱于日本时，“亚洲同盟”就演化为日本解放亚洲，日本带领亚洲、日本复兴亚洲的“日本盟主论”并最终演变为“霸主论”。近代日本“亚洲同盟”的主观思想的变化伴随着客观的亚洲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变化。在“亚洲同盟论”思想中始终有着“兴亚”与“侵亚”的两面性，并且逐渐“侵亚”吞没“兴亚”占据“亚洲同盟论”的主体，最后被完全吸收至“大东亚共荣圈”之中，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源流之一，彻底异化，走向歧途。

近代日本“亚洲同盟论”逐渐被“大东亚共荣圈”吸收，从而成为对外侵略的利器，极大地伤害了亚洲国家间的情感，也给日本与亚洲的国家改善关系带来阴影，使得亚洲国家谈其色变。当今世界，日本对于亚洲问题的处理也是推进亚洲区域合作的关键，是继续成为亚洲光荣的孤立者，还是放下所有的优越感，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融入亚洲，深深的牵动着亚洲人民的心。历史与现实都在告诉日本，只有放弃民族优越感，建立正确的亚洲观，处理好亚洲利益与日本利益的问题，勇于承认曾经犯下的历史错误，才能真正得到亚洲国家的信任，真正回归亚洲。

参考文献

一、日文著述

(一)日文专著

- [1] 由井正臣,安丸良夫,丸山真男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七卷[M].東京:筑摩書房,1976.
- [2] 有家永三郎,石母田正,井上光貞編.日本思想大系 45[M].東京:岩波書店,1971.
- [3] 有家永三郎,石母田正,井上光貞編.日本思想大系 55[M].東京:岩波書店,1971.
- [4] 江藤淳,松浦玲.勝海舟全集 1 [M].東京:訪談社,1972.
- [5] 江藤淳,松浦玲.勝海舟全集 2[M].東京:訪談社,1972.
- [6] 江藤淳,松浦玲.勝海舟全集 21[M].東京:訪談社,1972.
- [7] 江藤淳,松浦玲.幕末日記・勝海舟全集 1[M].東京:講談社,1976.
- [8] 江藤淳,松浦玲.永川清話・勝海舟全集 21[M].東京:訪談社,1973.
- [9] 勝部真長.勝海舟全集 2[M].東京:勁草書房,1979.
- [10] 勝部真長.勝海舟全集 18[M].東京:勁草書房,1979.
- [11] 松浦玲.明治の海舟とアジア[M].東京:岩波書店,1978.
- [12] 松浦玲.勝海舟と幕末明治[M].東京:訪談社,1973.
- [13]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M].東京:長陵書林,1893.
- [14] 中平亮.大亜細亞主義[M].東京:日本評論社,1933.
- [15] 野原四郎.アジアの歴史と思想[M].東京:弘文堂,1966.
- [16] 竹内好.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卷 9[M].東京:築摩書房,1963.
- [17] 小路田泰直.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義と日本主義の相克[M].東京:柏書房,1997.
- [18] 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M].東京:綠蔭書房,1996.
- [19] 西嶋定生.中国の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社会[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 [20] 瑞溪周鳳.善隣国宝記卷之中[M].東京:光榮堂,1987.
- [21] 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上[M].東京:岩波書店, 1963.
- [22]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會,1989.
- [23] 田中彰.日本近代思想大系・開国[M].東京:岩波書店,1991.
- [24] 伊東昭雄.アジアと近代日本:反侵略の思想と運動[M].東京:社会評論社,1990.
- [25] 中島端.支那分割の運命[M].東京:政教社,1912.
- [26] 徳富蘇峰.大日本膨脹論[M].東京:民友社,1894 年.

(二)日文期刊论文

- [1] 福家崇洋.帝国改造の胎動:第一次大戦期日本の国家総動員論とアジア主義[J].社会科学,2017(45).
- [2] 落合弘樹.<評論新聞>にみる明治前期民間人のアジア認識[J].駿台史学,2020(170).
- [3] 和田守.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連帯論と盟主論について[J].政治思想研究,2004(4).
- [4] 仲尾宏.坂本竜馬と勝海舟——立憲政体と三国同盟論の先駆け[J].演録/世界人権問題研究センター編,2004(131).

二、中文著述

(一)中文专著或译著

- [1] 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研究[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9.
- [2] 狭间直树著.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M].张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3]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4] 史桂芳.东亚联盟论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 史桂芳.同文同种的骗局—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
- [6] 张景全.日本对外结盟研究[M].北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 [7] 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M].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8]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M].张沛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
- [9]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0] 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形态论.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11] 许慎.说文解字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2] 司马哲.中庸[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
- [13]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 44[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4]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 16[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5] 李卓.近代化过程中东亚兰国的相互认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 [16] 信夫三次郎.日本外交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17]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18] 魏源.圣武记卷 12[M].湖南:岳麓书社,2011.
- [19] 姚莹.康輶纪行卷 12[M].西藏: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91.
- [20] 魏徵.隋书·倭国传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21] 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2] 张廷玉.明史卷 322[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3]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24] 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7.
- [25] 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混沌与治理[M].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 [26]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7] 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 [28]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M].中国:百城书舍,1918.

(二)中文学位论文

- [1] 李悦如.东亚视野下的“中日联合论”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 [2] 陈鹏飞.中日两国亚洲主义思潮的主流学派之比较[D].延边大学,2015.
- [3] 张弛.日本兴亚会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0.
- [4] 张梦鸽.胜海舟的中国认识[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0.

(三)中文期刊论文

- [1] 韩东育.东亚的生态[J].读书,2013(08):30-39.
- [2] 韩东育.关于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伦理问题[J].历史研究,2010(06):128-147+192.
- [3] 陈秀武.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55-60.

- [4] 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J].社会科学家,2006(02):25-27.
- [5] 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历史研究,2005(03):129-144+192.
- [6]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J].历史研究,2000(03):125-135+191.
- [7]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6):30-45.
- [8] 严绍.幕末的“宇内混同说”与明治时代的“大东合邦论”——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研究[J].日本学刊,1997(01):85-97.
- [9] 王美平.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辨析——以对华观为切入点[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07):21-29.
- [10] 王向远.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一种形态[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77-84.
- [11]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J].历史研究,2004(03):132-145+192.
- [12] 刘峰.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53-60.
- [13] 刘峰.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亚洲主义的理论与行动[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3(01):94-101.
- [14] 杨栋梁,王美平.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J].日本学刊,2009(03):117-130+160.
- [15] 章益国.日本亚洲观的近代转换——从“华夷变态”到亚洲侵略主义[J].社会科学家,2006(02):25-27.
- [16] 潘吉玲.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和伦理——关于近代日本文化的一些思考[J].日本研究,2005(04):85-91.
- [17]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J].历史研究,2000(03):125-135+191.
- [18] 周丽玫.从“亚洲一体论”的变质看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认识[J].东疆学刊,2019,36(01):45-49.
- [19] 孙歌.竹内好的亚洲主义研究[J].开放时代,2019(01):115-137+5-6.
- [20] 王美平.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辨析——以对华观为切入点[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07):21-29.
- [21] 戚其章.近代日本的兴亚主义思潮与兴亚会[J].抗日战争研究,2008(02):26-52.
- [22] 刘江永.历史教训与21世纪的东亚合作——论日本近代亚洲观的变迁[J].亚非纵横,2006(02):22-28+43+64.
- [23] 包霞琴.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与“东亚共同体”构想[J].国际观察,2004(04):53-59.
- [24] 刘岳兵.胜海舟的中国认识——兼与松浦玲先生商榷[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11-19.
- [25] 陈秀武.论胜海舟的国家思想[J].日本学论坛,2008(02):49-54.

后记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行文至此，百感交集，不知不觉已经在东师这个大家庭求学七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些许遗憾，些许憧憬，些许不舍，对未来充满热爱与希望的我也即将开启人生新的篇章。回首在过去的岁月里，感恩出现在我身边的每一位良师挚友，正是因为他们的教导与陪伴，才能让我的求学之路变得坦荡璀璨。花开花落万物道，聚散离别终有时，愿你们的未来如鲜花般灿烂。

一朝沐杏雨，一朝念师恩。感谢我的导师董灏智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到最终的成文定稿，是您陪我字斟句酌，是您帮我寻找文献，是您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帮我修改，倾尽所能的指导我。三年的求学之路，我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体谅、包容与耐心。回首一次次在人生的迷茫与低谷时，都是老师在学业与生活上为我指点迷津，是老师一次次安慰我，耐心指导我，鼓励我，一直相信我可以。一封封邮件，一条条语音，这些点点滴滴凝聚着老师对我的辛勤付出。在人生规划，职业规划，学业研究上，老师都倾尽所能对我给予帮助与指导，老师不仅仅是教授了我知识，更是我学习的榜样。是他教会我做学问要踏踏实实，要有一个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历史学习，是他教会我面对困难不要气馁，耐心的处理问题。正是有了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我才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力完成论文，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我将更加努力精进自己，来能回报老师一直以来的信任与帮助。

同时也要感谢韩东育老师、大田英昭老师、王明兵老师、韩宾娜老师在中期考核及预答辩时期对论文研究题目及方向提出的宝贵意见，正是由于老师们对我的论文进行指导与帮助，才有了论文的完整。也要感谢本科老师孙志鹏老师引导我进入东亚史的学习，并对论文提出宝贵意见，孙老师对我而言亦师亦友，在我的历史学习之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激发了我对于学习历史的兴趣。

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感谢父母对我的照顾与帮助，感谢你们见证了我的成长，教会我正直、善良的对待他人。谢谢你们的一路陪伴，为我的学习提供一切的支持与关心，你们永远是我一往无前的勇气与动力。

山水一程，三生有幸。感谢舍友，在三年的同居生活中，我们一起不断进步，不断提高，谢谢你们曾来路过我的世界，时光如驹岁月如梭，想念那些曾经一起学习和玩耍的日子，虽然未来方向不同，但我们是在中国的不同地方为自己的梦想而不断努力。真心的祝愿你们未来前程似锦，感谢黄曼琳、李建、黄滢、汪力等师兄师姐们的帮助与支持，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他们总会耐心的解答我的问题并对我进行帮助并提出建议。尤其在论文撰写方面，师兄师姐们总是为我提供许多可靠的研究思路与修改建议，并帮我解决一些原始文献翻译问题。感谢我的好朋友费献欧对我的论文进行校对，面对大量的文字，极具耐心的字字句句的修改，对我的论文进行了完善。感谢牛凯同学对我的论文进行排版以及积极帮我寻找资料，在我论文陷入瓶颈时，对我进行开导，对我的学习与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心。论文的一字一句都离不开这些朋友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求学之路不会如此幸运，感恩遇见。

最后，我要感谢一下自己，此去无论星辰大海抑或寻常巷陌，都希望自己能够始终保持初心，洗去浮华，做一名踏踏实实的学子，为社会发挥自己的一份光与热。